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日〕都留重人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日〕都留重人著

马成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日本経済の奇跡は終わつた
——消滅した高度成長の諸条件——
都留重人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日〕都留重人著

马成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32 3 1/4印张 62千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册
统一书号：4017·198 定价：0.27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都留重人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并曾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现为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朝日新闻》评论顾问。著述颇多，1975年日本《讲谈社》曾出版《都留重人著作集》，共十三卷。除学术活动外，他还参与过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

本书原系作者为《大西洋国际学会》撰写的特约论文，1977年2月以英文发表于巴黎，同年，日本《经济学人》杂志(5月3日、10日合刊号)全文转载了该文的日译文，并由《每日新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中译本系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日译文转译。日译文增加了一个副标题:《高速增长诸条件的消失》，中译本从略。

在本书中，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和过程作了一定的分析和说明，指出现在这些条件已经消失，日本经济陷入了“停滞膨胀”的深渊，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作者的看法在日本经济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有一定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对日本经济形势及有关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书中引用的不少资料也可供我们参考。

但是，应该看到，不能把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概述为资本主义的所谓“成功”，不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要对日本经济问题真正进行深入的、科学的分

析，就必须重视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战前军事、封建性结构的联系，以及它同战后帝国主义“冷战”体制的联系；必须强调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积累的榨取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性扩张以及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从属性和矛盾等等；尤其必须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决不能混同马克思和凯恩斯，希图对二者予以“沟通”。否则必然导致改良主义的结论，并只能起到维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所有这些，是作者在本书中未予解决或不能解决的，希望读者在参阅时注意。

目　录

一　迅速无比的增长——打破了经济学家的常识

当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战后日本经济急速增长的情况时，不由得令人想起我们这一行中最有洞察力的学者之一在四十年前讲过的话。凯恩斯先生曾在 1937 年“优生学协会”纪念高尔顿的讲演中，讲过这样的一段话——

“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 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 1%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率 1%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 1%”。①

凯恩斯的这番话是在本世纪的阴暗的三十年代中期说的，他在讲演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 1860 年到 1913 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为 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

但是，当回到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时代，而且把话题转向日本的时候，还是让我们引用其他人关于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

---

① 《优生学评论》1937 年 4 月号，第 16 页。

性的预测吧。战后初期曾作为占领军的技术专家来日本工作过的经济地理学家阿克曼博士，在 1949 年曾这样写道——

"假定人口继续增加，达到或超过一亿，那么根据对日本各种资源的分析加以考察，日本在今后三十年中将按下述两种估计之一的方向发展：(1)如果海外的资金援助能够无限地继续下去，那么日本将能恢复到战前 1930—1934 年的生活水平；(2)日本或许将能'自力更生'，但是由于在国内交织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因而只能逐渐向着仅可维持生存的水平发展。比起认为它可能通过对外贸易和先进的利用资源的方式独立地维持战前 1930—1934 年的生活水平来，日本朝着上述两种估计之一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更大。"①

日本的人口，事实上在 1967 年就超过了一亿；美国的资金援助，只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到 1951 年就停止了——它全部计为 18 亿美元，其中还有 4 亿 9 千万美元后来并不是白送，而是商定作为债务的。但是，平均每人收入到 1955 年却确确实实地达到了战前水平。②

其后，至少到 1973 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在二十年间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率 8％以上的水平。面对这一事实，凯恩斯将何言以对呢？不过，还是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基本的统计，看看事态是如何发展的吧。

对于掌握某一个国家总的经济活动来说，其简便的指标

---

① E.A.阿克曼：《日本的自然资源》，东京 1949 年版，第 528 页。

② 这里是把 1934—1936 年平均数字作为战前水平的，比阿克曼所设定的条件更为严格。另外，从平均每人的实际消费水平的比较来看，也达到了战前水平。

就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此有关的数字都列在第1表里。从平均每人实际收入大致恢复到战前水平（1934—1936年平均）的时候、即从1955年起，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没有一次低于5%，而且事实上在1955年以后的十年里是持

第1表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及人口增加率（1954—1973年，日本）

年份	国民生产总值（1970年价格）总额（百万日元）	增长率（%）与上年比	增长率（%）5年平均	人口增加率（%）	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 按1970年价格计算（日元）	增长率（%）与上年比	增长率（%）5年平均
1954	15,529.6	5.9		1.18	175,994	4.4	
1955	16,900.6	8.8		1.00	189,307	7.6	
1956	18,131.9	7.3		0.84	201,081	6.2	
1957	19,478.4	7.4		0.92	214,215	6.5	
1958	20,575.4	5.6	7.0	0.95	224,213	4.7	5.9
1959	22,403.0	8.9		0.84	241,825	7.9	
1960	25,407.5	13.4		0.93	271,973	12.5	
1961	29,065.9	14.4		0.95	308,270	13.3	
1962	31,100.2	7.0		1.03	326,747	6.0	
1963	34,345.6	10.4	10.8	1.07	357,186	9.3	9.8
1964	38,894.3	13.2		1.13	400,221	12.0	
1965	40,879.9	5.1		0.77	415,974	3.9	
1966	44,883.5	9.8		1.17	453,203	8.9	
1967	50,690.4	12.9		1.13	505,912	11.6	
1968	57,486.1	13.4	10.9	1.19	567,310	12.1	
1969	63,668.8	10.8		1.16	620,940	9.5	
1970	70,634.5	10.9		1.25	681,011	9.7	
1971	75,818.4	7.3		1.29	721,983	6.0	
1972	82,697.9	9.1		1.28	770,486	6.7	
1973	90,849.8	9.9	9.6	1.23	835,707	8.5	8.1

资料：经济企划厅：《国民所得统计年报》，1976年；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报》，1974年，1975年3月。

续跃进的。这一记录，恐怕可以和西德于五十年代前半期实现了 9.3%的增长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当时被称为"奇迹"的记录相匹敌了。

后来，从每五年为一期的平均增长率来看，西德是逐渐减速的，1955—1960 年为 6.6%，1960—1965 年为 5.0%，1965—1970 年为4.7%，1970—1974 年为 3.0%。但是，日本却直到发生"石油危机"的 1973 年以前，都是持续按年率 10%的速度增长的。从经济学家对维持高速增长可能性的常识来看，对日本从 1954 年到 1973 年这二十年间的实际增长应作出明确的说明。

二　各种结构性的变化

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

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用日本这个国家具有某种长期的发展趋势这种假设来加以先验的说明，即认为日本只不过是在摆脱了战争所带来的耗损和孤立及由此引起的暂时的停滞之后，又重新回到其固有的发展轨道上去了。

如果我们假定日本平均每人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率为年率 3.5%或 4%的话，那么上述说明对于1956年以前的时期来说似乎是有道理的。事实证明，这个数字在日本从明治时代初期、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可能实现的，因而并非是不着边际的数字。

若以 1934—1936 年的平均水平为 100，再按 4%的增长率划一条趋势线的话，那么到 1960 年的推计数值应为 267，1965 年应为 324，但是实际上 1960 年却为 162，1965 年为248。然而，到了 1970 年，按着推计数值应为 395，而实际数值则超过了推计数值，为 407。这一差距到 1973 年更扩大为 444对 499。很明显，比起这种趋势线的理论来，更需加以有实际内容的说明。

那么，简便的作法就是将与经济发展过程有关的事项间的各种恒等关系加以公式化，然后找出哪个事项在战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是属于特别重要的。

按照定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可以用劳动力（或者总劳动时间）的变化率(x)和劳动生产率（或者单位时间的产值）的变化率(y)之和来表示，也可以代之以储蓄率(α)和边际资本系数(β)之比来表示①，即 $G=x+y=\frac{\alpha}{\beta}$②。

如果将问题的焦点放到 $G=x+y$ 的关系上，那么首先可以指出的一点，就是日本在战败以后初期曾经获得非常充足的劳动力。在战败以后的几年期间，在有收入的职业上就业的劳动力合计起来为三千万人稍多一点，但是同一时间内日本的劳动力供应却突然增加了一千万人，其具体来源如下：

---

① 储蓄率，指储蓄部分与个人可支配收入之比。资本系数，指某一时期里的资本量与生产量之比。新增加的生产量与为此所需追加的资本量之比，称为"边际资本系数"。——译者

② 若以 Y 表示国民生产总值、以 N 表示劳动力、以 K 表示资本量，那么可以写成下列公式：

$$G=\frac{Y_1-Y_0}{Y_0},\quad x=\frac{N_1-N_0}{N_0},\quad y=\frac{\frac{Y_1}{N_1}-\frac{Y_0}{N_0}}{\frac{Y_0}{N_0}}$$

$$\alpha=\frac{K_1-K_0}{Y_0},\quad \beta=\frac{K_1}{Y_1}=\frac{K_0}{Y_0}\text{(假定资本系数固定)}$$

因而 $$y=\frac{Y_1}{N_1}\Big/\frac{Y_0}{N_0}-1=\frac{Y_1}{Y_0}\Big/\frac{N_1}{N_0}-1=\frac{G+1}{x+1}-1$$

$$\therefore\quad G+1=(x+1)(y+1)\text{ 或者 }G=x+y+xy\doteq x+y\text{(}xy\text{ 非常小)}$$

再 $$\alpha=\frac{K_1-K_0}{Y_0}=\frac{\frac{K_1}{Y_1}\cdot Y_1-\frac{K_0}{Y_0}\cdot Y_0}{Y_0}$$

因为假定 $\frac{K_1}{Y_1}=\frac{K_0}{Y_0}=\beta$

$$\therefore\quad \alpha=\beta\left(\frac{Y_1-Y_0}{Y_0}\right)=\alpha=\beta\cdot G\quad\text{或者}G=\alpha/\beta$$

因解除战争动员而退役离职的，710 万人；

主要从亚洲各地回国的，260 万人；

原军工部门解雇的工人，160 万人。

上述劳动力的大部分都是掌握有某种技术的健康人。他们因为在回到日本的正常和平生活之后不能立即找到工作，其中很多人便回到农村老家而形成庞大的变相失业大军的主体。这就是其后几年中间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后备军。而且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还减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从而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期间得以实现了低工资率，这种低工资率比起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应支付的工资要低得多。

这种低工资率的状况使得劳动力供给曲线出现了反常的变化，特别是促使妇女及老年人参加工作的比率提高。例如，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劳动力增加率维持了年率 3.5% 的水平，这是非常高的数字。增长率等式中的 x 系数（劳动力或者总劳动时间的变化率）由于人们大量涌向劳动力市场，因而在不特别提高工资率的情况下也保持了高水平。

而在提高 y 系数（劳动生产率变化率）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谓“赶”的过程。正当日本不断进行战争的期间，主要在美国的带动之下开展了“科学产业革命”，它和加紧战争相结合，把电子、航空技术、自动化方面的发明创造以及新出现的合成物质、原子能的利用等结合起来了。

这样，战后日本便在将最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方面被美国那样的国家远远地抛在后边。但是，日本却通过引进已经开发的技术发明和科技情报，迅速地赶上了其他发达国家。

在四十年代末期，日本劳动力的普遍熟练程度及经营者的能力都取得了十足的进步，因而能够比较顺利地吸取先进的技术，甚至象电子工业和照像机工业那样，还能在原基础上加以改良。特别是制造业的各个部门，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y)更保持了高水平，下边是表明这种情况的、每五年为一期的平均提高率①：

1955—1960年	9.2%
1960—1965年	7.6%
1965—1970年	13.4%
1970—1974年	8.9%

这方面的国际比较，已有几位日本的经济学家试着作过了。据调查，在1954—1963年的十年间，日本的平均年提高率为9.9%，居首位；意大利为5.6%；西德为5.0%；法国为4.7%；美国为2.9%；英国为2.3%②。

但是，对于说明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率之高来说，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日本的产业结构所出现的明显由附加价值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的结构性转变了③。即使没有各个产业部门本身生产率的变化和劳动力的增加，单是由于产业结构由附加价值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的转变，就能使国民生产值增加，这是简单的算术所能说明的。

假定经济是由两个部门构成的，其中一个部门的平均每

---

① "日本生产率本部"统计。

② 中山伊知郎、篠原三代平：《日本经济事典》(讲谈社出版)，第9页。

③ 附加价值，是资产阶级经济统计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指产品销售额减去原料费用和折旧费用所剩部分。——译者

人的产值为 10，另一个部门为 30，劳动力最初是以 50 对 50 平均分配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那么这时总产值便为 2,000。但是，如果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移动 10 个人的话，总产值则将变为 2,200，即增加 10%。当然，由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几乎都是更为需要大量资本的，因而为实现这种转变必须追加资本。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其产业结构急剧转变的历史。第 2 表就表明了在日本经济的三个主要部门里所雇佣的劳动力构成的变化。

第 2 表　雇佣的变化

	一次产业①		二次产业		三次产业	
	劳动力 (1,000 人)	比率 (%)	劳动力 (1,000 人)	比率 (%)	劳动力 (1.000 人)	比率 (%)
1947	17,810	53.4	7,430	22.3	8,090	24.3
1955	15,360	37.6	11,900	29.1	13,640	33.4
1960	13,400	30.2	14,810	33.4	16,150	36.4
1965	11,130	23.5	18,010	38.1	18,150	38.4
1970	8,860	17.4	21,440	42.1	20,560	40.4
1974	6,730	12.9	22,510	43.3	24,290	46.7

资料：总理府统计局。

在上述劳动力构成的变化中，一次产业所占比重的相对下降特别值得注意，这可以从三个部门的单位劳动力的相对获利能力来加以研讨。如以整个经济的平均获利能力为 1 的话，那么一次产业的获利能力则为 0.41，二次产业为 1.20，三

① 在日本的有关统计中，“一次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二次产业”包括制造业和矿业、建筑业；“三次产业”包括运输、金融、商业及其他服务业。——译者

次产业为 1.23。

而且在制造业内部，其附加价值率一般比轻工业高的重工业及化学工业的相对比重，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也有显著提高。重工业、化学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继从 1955 年的 51% 提高到 1965 年的 64% 以后，1975 年更进一步提高到 75%，这一比重目前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可能也是最高的了。

新产品的出现对于 1950 年以后工业生产的扩大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从第 3 表的统计中可以看得出来。

如第 3 表所示，从 1950 年到 1969 年期间，工业生产扩

第 3 表　新产品对战后日本工业生产扩大的相对作用

（1950 年的工业产量＝1.00，括号内数字为在各年统计中的百分比）

	1950年以前存在的商品 (a)	1951—1954年才出现的商品 (b)	1955—1959年才出现的商品 (c)	1960—1964年才出现的商品 (d)	合计
1950	1.00(100.0)				1.00
1955	2.05(92.8)	0.15(6.8)	0.01(0.5)		2.21
1960	4.14(81.8)	0.65(12.7)	0.2 (5.5)	0.03(0.6)	5.10
1965	6.65(72.7)	1.19(13.0)	0.93(10.2)	0.38(4.2)	9.15
1969	11.19(61.9)	2.43(13.4)	2.56(14.2)	1.90(10.5)	18.08

(a) 1950 年以前存在的商品为：钢铁制品、有色金属、机床、钢船、硫酸、硫氨、棉织品、水泥、玻璃。

(b) 1951—1954 年才出现的商品为：现金收付器、电冰箱、萤光灯、黑白电视机、乙内酰胺、喷气式飞机燃料、合成纤维及制品。

(c) 1955—1959 年才出现的商品为：拖拉机、复印机、温度调节器、电气扫地机、半导体收音机、电子计算机、氧化乙烯、丙烯腈对酞酸、聚苯乙烯、聚乙烯、合成橡胶。

(d) 1960—1964 年才出现的商品为：铝制窗框、小型电子计算机、加减法计算机、彩色电视机、二氧化乙烯、氨基甲酸乙酯、聚丙烯。

资料：1970 年度《经济白皮书》。

大了17倍，但是1951年以前的产品的比重却几乎缩小到了60%，新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石油化学产品的比重却持续大幅度地扩大。

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当然具有即使各个工业部门本身的生产率不发生变化也能提高整个经济平均生产率的效果。

储蓄率为什么高

如上所述，在最近二、三十年中间，日本的产业出现了典型的结构性变化，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更多的资本装备了。因而，很显然，如果没有足以促进这种结构变化的投资，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我们再将问题的焦点转到关于增长率的另一个公式、即增长率为储蓄率与资本系数之比（$G=\frac{\alpha}{\beta}$）这个公式上来。

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间，资本系数是不可能有悬殊的差别的，因而要维持特别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有较高的储蓄率。如果作一下国际比较的话，那么正如第4表所示，最近一些年

第4表　储蓄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的国际比较

	1964—1968年平均（%）	1969—1973年平均（%）
日本	36.2	39.5
美国	15.7	14.8
英国	18.8	19.2
西德	26.7	27.4
法国	25.7	27.0

资料：1975年度《经济白皮书》，日本的数字为财政年度（从4月1日开始）数字。

来日本的国内总储蓄①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明显地高于其他工业国家。

当然，问题在于日本为什么实现了如此之高的储蓄率，这是一个本身极为有趣、而且复杂的问题。虽然在这里不能充分地加以分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日本的家庭具有传统性的、比其他国家更强的储蓄倾向，这些储蓄就通过各种金融机构而被贷给了法人企业。当然，许多国家都是家庭部门有了结余而为企业部门所利用的，但是对货币流通的分析表明，企业投资资金对家庭的依赖程度日本是非常之高的。

最清楚地表明上述情况的，就是日本制造业的经营对于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这一点可以从金融费用（主要是支付利息）在成本构成中所占较高的比重上表现出来。

如果以劳动力成本为100的话，那么1965年日产汽车公司的金融费用便达90.2，松下电器公司达50.5。而按照同样的比法，（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金融费用则为0.3，（西德）大众汽车公司为1.4，（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为0.4。这方面的差别之大，简直令人瞠目。这也反映出了日本产业界和金融界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

日本的家庭与其收入相比具有较强的储蓄倾向这一情况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同时也必须通过这种说明来回答这一特点今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

---

① “总储蓄”，亦称“总积累”，是资产阶级经济统计中的一个概念，它系指私人企业、政府和个人三个部门“储蓄”的总计。其中私人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系指它们的积累。——译者

对于上述问题，过去曾有过几种说明，例如：(1)每年6月和12月发放相当于三个月或3个月以上工资的“奖金”这种传统的习惯，必然使支出落后于收入，进而提高储蓄的倾向；(2)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不完备，这样出于对将来的担心必然使日本的个人储蓄率比其他多数发达国家为高；(3)在日本仍然存在按工龄计薪的这种固定的工资制度，而工龄长的人比起那些尚有子女上学或准备结婚的人们来说，其实际的消费需要更小，这样便增强了工龄长的人的储蓄倾向；(4)在日本的家庭部门之中包含有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私人企业，他们不单是以家庭的身份、而且还同时以企业的身份进行储蓄。

三　外部的条件

有利的汇率

说明经济增长的工具，当然不能仅限于前一章所详细说明的那种与总的经济分析有关的诸因素。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还有对于某一国家经济的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常常是通过有利的汇率来起作用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则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采取的特定的政策措施。下面将分别就这两个问题加以分析。

战后日本制定单一的汇率是在1949年4月，当时日本还处于被占领之下，其经济多多少少仍在战败后的停滞的深渊中挣扎。若以战前平均（1934—1936年）水平为100，194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才为58.5，农业生产指数为91.1，出口量为7，进口量为18，城市生活平均每家的消费指数为63.8。① 换句话说，1949年日本的经济虽然明显地进入了恢复的过程，但是仍未达到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日本制定单一的汇率（使日本出口的主要部分不被完全排斥在外国市场之外的汇率），这就好似对一个因多年患病而球艺荒疏、痊愈之后又重新上场的打高尔夫球者决定他的加打次数

① 都留重人：《日元》，见《财政学与财政法规》第44卷第4期（1952年），第746页。

一样。①

假如他在患病之前的加打次数为18次，但在他重新打球以后，他的朋友们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允许他加打24次。但是，即或有这样的照顾，他恐怕还是难以和他的朋友们较量。日本在1949年所处的条件就象这个久病初愈的打高尔夫球者一样。

当时日本的出口商品，不管国内具体的生产成本如何，都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售。这样，每个具体的出口商品都有一个事实上的交换比率，只是这种比率不具有作为基准的效用。

例如，日本出口的缝纫机，在国外可以卖40美元，而在国内的生产成本却为2万4千日元，这时它的交换比率就是1美元等于600日元。在对外贸易重新开始进行的1947—1948年，按照上述方法计算的交换比率大致在1美元等于180日元到800日元的范围之间，平均起来为1美元＝450日元。

另一方面，当时的进口商品虽然以国际市场价格买进，但在当时普遍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为了把成本负担压到最低限度而按统制的价格在国内出售。这样，进口商品的默契的交换比率则为1美元＝150日元，日元价值偏高。

这也就是说，在对外商品交易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补助金的这种因素的，这从1947年的“贸易资金特别会计”(接受进口商品的日元货款、向国内出口商支付日元货款)的收支情况

---

① 在高尔夫球比赛中，为了平均比赛双方技术优劣的差距，除规定基本的打数以外，还规定不同的加打次数。例如，一般18个洞的球场规定的基本打数为72次，另外还允许加打18次或24次等(以最少的次数将球打入洞内为佳)。——译者

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该年度尽管出口只为1亿7千万美元，进口则为5亿1千万美元，但是在“贸易资金特别会计”之中仍然出现了赤字。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于1949年4月制定了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这便意味着当时许多出口商品因为价格高而不得不退出市场、大部分进口商品则突然大幅度涨价。事实上，当时就有人指出，对于还处于恢复的初期阶段的经济来说，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真是过于严酷了。

但是，在1949、1950年以后，由于日本经济极迅速地恢复了元气，因而单一汇率的不利影响便很快地结束了。这正象那个打高尔夫球者的情形一样，在他久病初愈时允许他加打24次这种照顾至今仍令他感到吃不消，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健康，又充分显示出在生病之前加打18次时的球艺来了。

如果规定的加打次数不变，继续为24次的话，那么随着身体的恢复，将对他变得越来越有利。一般说来，日本在恢复发展和技术上“赶”的过程中，1949年制定的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使它享受了上述那个打高尔夫球者同样的好处。

例如，战后最早获得成功的出口商品之一的缝纫机，在1949年其制造成本为每台2万4千日元，当时按照1美元＝600日元这种实际上的交换比率，其离岸价格为40美元。但是到1960年，由于制造成本大幅度下降，其结果，按照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计算的离岸价格猛降至12美元。

换言之，1949年制定的汇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日元实际上贬值了，因此有力地刺激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众所周知，到了1971年，日元便升值为308日元兑换1美元了。

政府的奖励补助金

在战后“赶”的过程中，固定汇率对于出口是很有好处的，这可以用来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明出口扩大的原因。但是就各个具体的工业部门来说，有关的因素则肯定是更为复杂的。其典型的例子仍然是缝纫机制造业。

战前日本国内缝纫机市场是被进口的“胜家”缝纫机所统治的，而象“三菱”、“弟兄”这样的日本制造厂家只是在军用缝纫机领域才得以存在下去。

战争结束后，由于出现了一系列偶然情况，促使一部分人们打算首先培育国产缝纫机制造业去代替进口货，然后几乎同时把它发展成为出口产业。这些偶然的情况有：

大量存在着即使工资低也乐于参加工作的机械工人；存在着闲置的小型的家庭式车间，特别是在大阪地区更多；大约有 60 万台机械不得不由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

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市场在战后最初几年里需求极为旺盛，美国的厂家（主要是“胜家”）尚不能充分满足国内需要。

这种情况，对于在小型车间制造零件、而在另外的企业单位（装配厂）组装成品这种类型的产业组织来说，是相当有利的。但是，通过这样开放性的社会分工来生产某一产品，便相应地不利于实行严密的标准规格化。

但是，这一问题却由于中央政府及地方自治体的家长式的指导而得到了解决。而且，这种开放性的分工还有肯定有利的一面。其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大量生产的好处；另外可以分散因难以估计美国市场条件而产生的风险。

就这样，到1949年底，便出现了许多缝纫机制造厂，总计月产量约为3万架，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用于出口。当时，从零件到成品进行连续生产的综合工厂的产品所占比重为25%。

但是，经过2年时间、即到1951年底，月产量便增加到13万5千台，其中供出口的达8万台，上述进行连续生产的综合工厂所占比重则降至5.4%。这一时期，生产成本也急剧下降。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之一就是1951年政府采取的关于进口最新式机械的补助金制度。

当时规定进口这类机械，其进口价格的50%由政府来支付。对国内生产类似机械、尚处于初期阶段的厂家，政府也给予相当于成本一半的补助金。

这种补助金制度的目的在于振兴整个机械工业。但是因为当时使用机械的其他制造业或者尚未充分开工生产（如国内的电气机械制造业），或者尚处于萌芽期（如汽车工业），因此主要受益者还是缝纫机制造业。

由于日本的缝纫机制造业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当然就要在两个战线上出现竞争。其一是在日本国内和“胜家”打官司，“胜家”公司从1953年起便企图建立合办企业。

另一场竞争是稍后发生在欧洲的，那里反对日本缝纫机的动向越来越强烈。在这两个战线上，日本政府都支持了日本的缝纫机产业，其作用如同家长一样，非常周到入微。

“胜家”当时采用的战术是揭发日本制造商使用了容易与“胜家”公司相混淆的商标（例如“新家”），还揭发说日本剽窃了“胜家”的专利（例如有关刻盘式张紧装置部分）。

另方面，“胜家”公司还企图和“日本炼钢公司”的子公司、

从兵工厂改变过来的“派因”缝纫机厂这个日本企业建立合办企业。此外，还指责日本厂商把在国内市场售2万5千日元的缝纫机以1万日元的低价向外国市场倾售。

“胜家”公司一心想作为缝纫机制造商打入日本市场，而日本政府在1958年也终于同意了它和“派因”公司建立合办企业的计划。但是，这种同意是以限制在日本的生产数量为条件的。当时，日本在本国的制造厂已经强大得足以对抗“胜家·派因”公司的任何竞争了。

实际上，到五十年代的后期，日本的缝纫机便逐渐成功地打进了欧洲市场，在那里“胜家”（曾在法国占首位）和西德的“帕福”及“安卡·凤凰”公司曾是主要供应者。

欧洲共同市场各国对日本缝纫机的打入，最初的反击是想对日本缝纫机的进口课以从价税再加特别税的“混合税”。这样的“混合税”，当时已经对日本的陶磁制品征收了。

而且有人还提议，其特别税部分应当等于共同市场的最低价格和从日本进口价格（当时为10到12美元之间）的差额。现在回顾起来，日本的缝纫机出口商当时使共同市场各国放弃采用“混合税”的想法，而成功地在欧洲市场站住了脚，这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从1961年到1964年期间，为了取得这种成功，日本政府的驻外机构以及官员、特别是“日本贸易振兴会”① 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极端典型的家长式的。

当时必须冲破的主要反对者是西德。日本为此采取的战

① “日本贸易振兴会”，是由日本政府出资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其活动范围是从事市场调查、商品宣传和举办展览会、出版宣传书刊等。——译者

术是：(a)首先在“法兰克福汇报”等报纸上登载广告；(b)获得喜欢廉价商品的消费者组织和特约经销店的支持；(c)向以日本为主要顾主的、有影响的西德的机械工具制造商声明，如果限制日本的缝纫机进口就将对西德的对日出口采取报复措施；(d)在政府间谈判过程中，巧妙地引用艾哈德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来为日本辩护①；(e)邀请有影响的政界领导人和西德的缝纫机制造商访日。

当时有几件事情帮了日本的忙。例如，1961年8月的“柏林铁幕”造成的东西隔离，致使许多人秘密地流入西柏林，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业门路便是转包裁缝业，廉价的日本缝纫机就因此而极受欢迎。

日本的“弟兄”缝纫机公司很早就在爱尔兰设立了装配厂，而爱尔兰与西德有着极其友好的外交关系。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非差别原则，如果采用那个成为悬案的“混合关税”方式的话，爱尔兰对西德的缝纫机出口便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事实上，爱尔兰已对西德政府表示过不满，波恩政府为此而深感为难。

还有一件偶然的事情，就是曾被戴高乐总统称为“半导体收音机推销员”的池田首相1962年的欧洲之行，找到了能够缓和西德“缝纫机制造业者协会”的反对态度的办法。当时该协会会长舒瓦尔博士是“安卡·凤凰”公司负责缝纫机部门的重要领导人，而这个公司对于经营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正抱有极大的热心。

---

① 艾哈德，当时西德政府的经济部长。——译者

并且，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不过是想向西德的制造商推销零件，而并不一定要向西德市场推销成品。

此外，"日本贸易振兴会"还在邀请西德产业界代表访日时，带他们视察了几个零件制造厂，他们因为到处都能看见带有"胜家"商标的零件在日本生产而感到大为震惊。因为"胜家"公司已是西德制造商的主要竞争对手，这就打消了他们对日本的不满。

就这样，日本的缝纫机制造厂商终于成功地在欧洲各国中最强的市场上站住了脚跟，其后虽然也多多少少地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是由于能够因应变化也就都克服了。

在缝纫机制造业发展成为战后实际上最早获得成功的出口产业的过程中，为了援助和支持它，日本政府的官员在每一个阶段上都表现出了热情的关心和顽强的献身精神，这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促进出口的双重价格制

通过以上对促进缝纫机出口过程的详细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固定汇率对于出口发挥的强大作用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知道了政府的具体政策对于帮助某个产业部门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以更为系统的方式来论述问题的这一个方面。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要谈一谈影响扩大出口的价格效

---

① 这部分叙述据林信太郎博士(从1961年初到1964年8月曾任日本贸易振兴会负责轻工机械的理事)所写《对战后产业史的证言》(《经济学人》杂志1976年6月1日、8日号)。

果的另一个侧面、即实行出口产业的双重价格制问题。如上所述，在振兴缝纫机出口的阶段，出口交易价格实际上还不到国内市场价格的一半。

只要一出现这样的机会，这种形式的低价倾销就并不罕见。所谓机会，就是为了开拓新市场，或者为了弥补因国内销售困难而产生的需求不足。

五十年代中期钢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危机的情形就属于后者的例子。日本的钢铁业通过国内销售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时，也常常以比国内售价低三分之一的低价努力向海外倾售，当时这是一种普通的作法。①

钢铁业最近已经不依靠这种作法了。但是，化学肥料则不同。这一部门常常把出口价格（离岸价格）降到国内批发价格的四分之三或四分之三以下。

第5表中所表明的硫氨的情况，就可以用来作为化学肥料部门的最典型的例子。其出口价格对进口价格的比率除了1964年和1965年超过90%以外，从1959年到1967年期间一般都在75%左右。

1967年以后，上述比率开始急剧下降，到1971年竟降至39%这种低水平，后来则又回到了75%的水平——但是“石油冲击”的第二年、即1974年属于特殊情况，又当别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硫氨的内外需求中出口的比重常常约在二分之一左右，而突出的最大买主（证明是个厉害的买卖对手）则是中国。

---

① 见《经济学人》（1976年6月22日号，第79页）所载林信太郎博士的文章。

第 5 表　硫氨的国内及出口价格(1959—1975 年)

(每吨的美元价格)

年份	国内价格(A)(标准批发价格)	出口价格(B)(平均离岸价格)	(B)÷(A)(%)	日元对美元比价(日元)
1959	54.09	41.48	76.7	360
1960	52.61	40.71	77.4	360
1961	52.04	38.16	73.3	360
1962	51.81	36.81	70.6	360
1963	51.25	37.94	74.0	360
1964	50.69	47.07	92.9	360
1965	50.33	47.52	94.4	360
1966	49.91	38.64	77.4	360
1967	48.38	34.34	71.0	360
1968	47.13	31.88	67.6	360
1969	46.44	30.02	64.6	360
1970	45.75	24.38	53.3	360
1971	52.25	20.53	39.3	308
1972	53.49	25.98	48.6	292
1973	57.00	45.08	79.1	274
1974	79.89	109.86	137.5	295
1975	78.56	58.36	74.3	300

资料：日本兴业银行产业调查部，年次为该年的肥料年度(从 7 月 1 日开始)。

是出口主导型的增长吗

尼古拉斯·卡尔多曾经作为从政策方面对英国提出的要求而暗示说，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用出口补助金或降低汇率刺激出口的办法来提高增长率。①

上述分析表明，日本在一个时期里恰好享受了低汇率，并且许多出口工业部门也依赖过相当于出口补助金的双重价格

① 《国家经济诸目标中的矛盾》，见《经济》杂志(1971 年 3 月号)，第 1 — 6 页。

制。很显然，日本的出口通过这种偶然性和这种政策而受到了刺激。

然而，问题在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因为振兴出口而搞上去的，以及振兴出口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

如果单纯地依据事实而论，那么不可否认，日本在急速增长时期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1）出口一直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速度扩大；（2）物资及劳务的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两者都按不变价格计算）从1958年的7.6%持续提高，到七十年代初期已达14%或14%以上；（3）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出口部分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在过去二十年间或多或少是持续上升的。

但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作为一种分析的概念来说，却不一样。例如，理查德·凯维斯指出，如果经济增长是以出口为主导的话，那么就必须有能带来经济的利益及使实际收入增加的外部的作用因素，并且还必须能把它和由于增加人力及物力的投资而出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以明确的区别。①

根据凯维斯的说法，区别外部的作用因素和国内的作用因素的简单试验就是看一看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是成正比例的，还是成反比例的。

如果是成正比例的话，那么作用因素就在外部；如果是成反比例的话，那么作用因素就在于国内供给的变化。

罗林斯·库劳兹在关口季夫先生的帮助下，把凯维斯的

---

① R.E.凯维斯：《出口主导型的增长和新经济史》，见J.N.巴瓦迪等编：《贸易、国际收支和增长》（北荷兰出版社），第403—442页。

试验用于日本，发现“1961 年出口价格指数为 92.0(1970 年=100)，而到 1968 年尽管出口量大幅度地增加了232%，但是出口价格指数却只为 92.9，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六十年代的几乎所有年份，日本的经济增长大体上不是以出口为主导的。”①

库劳兹也承认，“日本的增长从分析的意义上讲，大体上是明显不属于出口主导型的，但是并非因此就意味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不重要”。

并且，他还指出，增加出口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可以容许能从大规模生产中得到好处的工业部门进一步地扩大生产。但是，这些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中的大部分是在国内销售的，因此对增长的刺激主要还是起因于国内方面”。②

凯维斯提出的“如作用因素主要由海外需求所产生，那么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就成正比例”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或许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所表现的理论模式本质上却是静态的。

某种特定的工业部门由于利用了双重价格制而发展成为出口工业，接着为了充分利用大量生产的好处又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其结果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形成反比例，这种情况即使抽象地加以考虑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对日本在最近二十年的出口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工业部门加以详细分析，那么便可以证明，通过投入更多的

① 《日本和世界经济》，见 H.帕特立克和 H.罗索斯基合编：《亚洲的新巨人——日本经济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布鲁金斯学会 1976 年出版)，第 400 页。

② 同上书，第 401—402 页。

人力和物力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是由于努力扩大出口的成功，才得以成为现实的；而且，建元正弘先生还指出，扩大工厂及设备的投资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是不能和出口分裂开来的。①

在缝纫机之后，接着便是照像机工业，再后便是手表制造业，后两者都是随着出口的增加而扩大了生产的，因而充分地利用了大量生产的好处。第6表以价额的形式表明了这两个生产部门扩大的过程，同时也表明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出口部分如何变得更为重要了。

第6表　手表和照像机的生产、出口及进口

（单位：百万日元）

	手表及其他计时器			照像机及零件		
	1955	1965	1975	1955	1965	1975
生产(A)	8,039	58,161	227,179	10,649	66,259	242,127
出口(B)	453	8,633	106,575	1,680	31,236	155,275
进口	567	2,416	31,967	28	331	10,768
(B)÷(A)(%)	5.6	14.8	46.9	15.8	47.1	64.1

资料：《经济学人》1976年6月15日号。

第7表　照像机出口的比较（单位：架）

	西　德	美　国	日　本
1965	2,255,000	907,000	1,611,000
1974	3,059,000	1,978,000	4,846,000

资料：《经济学人》1976年6月15日号及1975年版《通商白皮书》（各论）。

在1953年，日本生产的照像机可以说实际上尚没有外销，但是就在这一年，政府却已经成立了"照像机出口检查协

① 建元正弘：《日本的稳定政策及其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的关系》（1974年6月1日提交给在马萨诸塞州召开的"公共经济学国际讨论会"的论文）。

会”，其目的在于保证产品质量，以便使日本的照像机在海外的形象一开始就不受到损害。

日本的照像机在确立了高质量的形象之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我们从第7表的三大照像机出口国的出口数字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上升到了世界出口市场的首位。

政府的家长式指导

缝纫机、照像机以及手表这些出口工业部门获得成功的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无疑地体现出了战后日本在发展时期的跳跃式的特征。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三个部门合计起来也占不到日本通常年头出口总额的2％，因此它们远远不是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出口扩大的主要角色。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一下象钢铁制品、汽车以及船舶这样的现在的主要出口商品，研究它们的生产和出口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而且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这些主要工业部门也基本上同样存在着在缝纫机制造业获得成功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基本因素，即政府的家长式指导随着事态的进展，促进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和扩大生产规模来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改良质量，同时在国内竞争和政府对出口的援助之间掌握平衡。

第8表到第10表概略地表明了上述三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表明了出口部分在每个部门产量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断提高的。

从1955年到1975年，按美元计算的日本出口额扩大了

第 8 表　钢铁制品的产量、出口量及进口量

（单位：千公吨）

	生产(A)	出口(B)	进口	(B)÷(A)(%)
1950	3,754.3	399.0	1.5	10.6
1960	17,855.0	2,044.3	176.4	11.4
1970	77,570.2	16,123.3	32.1	20.8
1974	101,970.7	30,765.1	81.4	30.2

资料：篠原三代平：《产业构造论》(筑摩书房，1976)。

第 9 表　汽车的生产、出口及进口辆数

（单位：辆）

	生产(A)	出口(B)	进口	(B)÷(A)(%)
1957	47,121	410	6,179	0.9
1960	165,094	7,013	3,450	4.2
1967	1,375,755	223,491	14,352	16.2
1974	3,931,842	1,727,396	42,218	43.9

资料：篠原三代平：《产业构造论》，第 287 页。

第 10 表　船舶产量及出口量

（单位：千长吨）

	生产(A)	出口(B)	(B)÷(A)(%)
1955	735	384	52.2
1960	1,759	934	53.1
1970	9,917	7,606	76.7
1974	17,541	15,596	88.9

资料：日本银行《日本经济年报》1975、1976 年。

第 11 表　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钢铁制品	汽　车	船　舶
1950	8.7	0.0	3.2
1955	12.7	0.3	3.9
1960	9.6	1.9	7.1
1970	14.7	6.9	7.3
1975	18.3	11.1	10.8

资料：从上述日本银行的统计中算出。

26.7 倍，但是如第 11 表所示，上述三个主要出口商品却增加得更快，其合计所占比重不断扩大。

毫无疑问，日本由于处在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整个世界贸易获得罕见的迅速发展这种偶然的理想环境之中，并且得以利用了这一点，从而实现了几乎比整个世界贸易增长率高一倍的出口增长率。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工业在六十年代后半期雄姿勃勃地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它把过去引进的一系列革新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了巩固的基础，其许多工业部门已在劳动生产率和在世界市场中所占比重方面跃居前列。

1965 年到 1971 年期间，日本所增加的出口量在除“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世界贸易量增加的部分中，钢铁制品占 54%，汽车占 46%，民用电机电器占 90%，钢船占 54%，一般机械占38%。①

从下边的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到，按平均每个职工创造的价值量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日本的企业到 1971 年已在许多现

第 12 表　每个职工平均产值的比较(单位：千日元)

钢铁	日本(最大三家企业)	13,605
	美国(最大六家企业)	9,226
	西德(最大四家企业)	9,479
汽车	日本(最大二家企业)	22,210
	美国(最大七家企业)	11,321
	西德(最大二家企业)	6,393

① 海野武：《日本经济的中期展望及结构变化》(日本兴业银行 1976 年出版)，第 4 页。

轻电器	日本：松下	16,532
	日本：索尼	14,787
	美国：埃马逊	8,568
	英国：E.M.I.	4,534
化学制品	日本(最大二家企业)	20,741
	美国(最大七家企业)	11,301
	英国：帝国化学工业	6,439
	西德：拜耳	4,525
合成纤维	日本(最大三家企业)	13,097
	美国(最大三家企业)	8,643
缝纫机	日本(最大三家企业)	7,222
	美国：胜家	5,388

注：企业数目在两个以上的为平均数字。

代工业部门列居首位了①，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平均每个职工创造的价值量当然要受到生产企业的统一程度的影响。日本的企业一般说来依赖承包的程度比其他国家高，因此附加价值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即或考虑到这一点，日本在制造业的许多部门里现在还是占有优越地位的。

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

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出口的急剧增长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方面对日本的过分依赖。列于第13表中的钢铁制品和塑料的情况就是例证。1971年，亚洲地区在钢铁制品和塑料方面对日本的绝对依赖程度分别达69.9%和79.4%。

但是，在这些国家从1965年到1971年期间消费增加的

① 通产省：《世界企业经营实绩比较分析》(1973年)。

第13表 发展中国家对日本的依赖程度

(1965年到1971年，钢铁制品和塑料的情况)

	钢铁制品			塑料		
	在进口总量中对日本的依赖程度		1965到1971年增加部分中日本的比重	在进口总量中对日本的依赖程度		1965到1971年增加部分中日本的比重
	1965 (%)	1971 (%)	(%)	1965 (%)	1971 (%)	(%)
亚洲	48.4	69.9	94.3	51.0	79.4	89.8
中东	12.0	33.8	67.0	3.9	22.5	31.5
拉美	24.5	54.3	103.3	6.5	30.2	40.6
非洲	14.3	32.8	108.9	5.0	24.0	36.0
发展中国家计	29.6	54.5	93.0	25.7	53.1	64.9
世界合计	16.4	25.2	41.1	13.1	24.6	31.1
在日本出口总量中发展中国家的比重	40.3	51.3		57.9	69.7	

资料：海野武：《日本产业的中期展望及结构变化》。

部分中，日本所占的比重更值得注意。就钢铁制品来说，从日本的进口事实上相当于其消费增加部分的全部，塑料则几乎达三分之二。这种趋势因为迟早要在各个市场上受到抵抗，因此是难以继续下去的。

而且，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扩大国内的重工业生产。事实上，在日本的钢铁制品出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在1971年为51.3%，但是其后便趋于稳定，不过在50%上下稍有增减而已。

日本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出现的这种出口高潮，在更长期的历史的展望中，恐怕将要成为一个插曲。对于日本来说我想最好要注意到这个插曲的性质及其所意味着的一切。

四　持续的投资热潮

七个日本式的特征

正如前一章所说明的，出口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从总的经济分析来看，私人投资支出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

关于这一点，在第二章的前半部分，通过对各发达工业国家的国内总积累（贮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的国际比较，已经概括地叙述过了。在这里特将重点放在支出方面，比较一下第14表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几个成员国除住宅以外的企业设备投资对国民总支出的比率。

日本的比率水平从上述期间平均值（18.4%）来看，只比西德或法国高3—4%，但是从其中每一年的情况来看，却总是最高的。再从同一期间库存投资对国民总支出的平均比率来看，日本的比率最高，为3.3%，以下按顺序排列为法国(2.2%)、意大利(1.3%)、西德(1.1%)、美国(1.0%)、英国(0.8%)。

从这些国际比较中看到私人投资在国民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竟是如此不同，对此也许会有人只是简单地把它归因于各国企业家的气魄的差异。但是，如果按照年度和部门来对事态的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调查，那么就会发现，就日本来说，是存在着几个可以称为“特有现象”的特殊性规律的。

第14表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部分成员国企业设备投资（不包括住宅）对国民总支出的比率（1962—1974年）（%）

	日本	美国	英国	西德	法国	意大利
1962	20.0	5.6	7.7	16.1	14.0	14.4
1963	18.2	5.7	7.4	15.5	14.0	14.5
1964	18.6	6.0	8.1	15.9	14.2	11.9
1965	15.9	6.6	8.2	15.8	14.1	10.8
1966	15.8	6.9	7.9	15.2	14.6	18.8
1967	17.4	6.6	7.6	13.5	14.7	11.4
1968	18.8	6.6	8.0	13.7	14.5	11.8
1969	20.1	6.8	8.4	15.1	15.1	11.9
1970	20.1	6.4	8.5	16.7	15.4	12.5
1971	18.7	6.1	8.1	16.7	15.5	12.6
1972	17.6	6.3	8.0	15.8	15.7	12.3
1973	19.1	6.7	8.5	14.8	15.5	13.4
1974	17.8	6.6	9.4	13.2	15.9	14.8
平均						
1962—1964	18.9	5.8	7.7	15.8	14.1	13.6
1965—1969	17.6	6.7	8.0	14.7	14.6	11.3
1970—1974	18.7	6.4	8.5	15.4	15.6	13.1

资料：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1976年版，第23—38页。

那就是：（1）通产省的温情主义的行政指导；（2）对填海造地建厂的先行公共投资；（3）保护私人企业的各种特别减税免税措施；（4）低利率政策；（5）对工业用水、用电的特别补助措施；（6）有意推迟实行贸易及外资流入的自由化；（7）主要企业集团的所谓"配套主义"。为了说明的方便，先谈上述各点之中的第（7）点，其他项目则按顺序加以说明。

配套主义

日本的主要企业集团采取"配套主义"是战后的现象。战

前的日本经济是由被称作“财阀”的很独特的垄断体制所统治的，而各个财阀则以特定的领域为重点（在某种程度上），在以家族所有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之下对广泛的企业和事业活动进行统治。

战败以后，占领当局根据美国总统关于支持“解散过去统治日本大部分贸易及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与银行的巨大结合体计划”的指令①，采取了解散财阀的严格措施。按着这个指令，采取了许多诸如解散财阀本部、排除财阀系统对企业的统治等切断过去财阀之间联系的措施。

但是，单是这些措施还不被认为是充分的，进而又于1947年6月由“远东委员会”发出了要求分散经济力量的指令。后来（1947年12月18日），国会通过了以防止复辟或重新形成垄断为目的的、称作“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的法律。这样，就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令人感到似乎日本为垄断所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过去与旧财阀属于同一系统的大银行作为金融机关却原封未动地被保存了下来。在战后复兴初期，对于企业的投资活动来说，从外部筹措资金是必须的条件，上述大银行就在这种资金供应过程中，不久便占据了中枢的地位。战前和战后企业资金供应状况的这种鲜明的区别从第15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即是说，战前在企业资金供应来源中，自己资本占绝大部分比重，金融机关的贷款仅占12.8%；但是，在战后初期典型

---

① T.A.比雪翁：《日本财阀的解散》(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部，1954年)，第239页。

第 15 表　战前和战后的企业资金供应来源(%)

	自己资本①			借贷资本			
	内部保留	增资	计	公司债	金融机关贷款	政府方面资金	计
1934—1936年	29.0	57.0	86.0	0.3	12.8	0.9	14.0
1951年②	18.4	7.5	25.9	3.5	62.8	7.8	74.1

①不包括折旧费;②为会计年度。

资料:经济安定本部:《年次经济报告》,1952 年度,第 39 页。

的一年——1951年,两者的作用正好颠倒了过来,对金融机关贷款的依赖程度增大到62.8%。

这样,商业银行便成为制造工业部门中期和长期投资资金的主要供应者,其放款的资金不仅从家庭储蓄中筹措,同时也逐渐转为依赖向中央银行借贷了。而且,商业银行还是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更为明显、有能动作用的企业股东。

这些大银行因为是旧财阀系统的银行,因此它们非常自然地要和曾是“财阀家族”、即各个财阀组织成员的企业发生联系。这种倾向,从和约生效、日本摆脱了占领当局统治的1952年 4 月以后就特别明显起来了。后来,由于修改“禁止垄断法”(1953年 9 月 1 日实行),更大大地促进了按着旧财阀系统来合并和改组企业。

这次修改,决定容许制造工业部门的企业持有竞争对手企业的股票,将金融机关持有企业股票的比率的最高限度由 5 %提高到 10%,使企业之间互派负责人的制度合法化,以及扩大组织卡特尔的范围。在这种企业的合并和改组的过程中,旧财阀系统的银行利用在金融交易中形成的与企业的必然联系,起到了加强结合的作用。

例如，“三井银行”同“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大正海上火灾保险”等三井集团的金融机关一起，对“三井矿山”、“三井金属”、“三井物产”、“三井造船”、“三井不动产”、“王子造纸”、“三井石油化学”等三井系统的企业优先给予贷款。

从组织上来说，虽然没有战前那种处于集团之上的持股公司，但是三井系统企业的主要头头们却以交换情报为目的，以“二木会”的名义定期进行集会。三菱及住友等其他集团也是同样的情况。

因此，不能否认现在还存在着其紧密结合程度不亚于战前的财阀型企业集团，它们在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正起着领导性的作用。事实上，日本三大财阀型企业集团占法人企业缴纳资本总额中的比重如第16表所示，从战前以来一直是趋于增大的。①

第16表 主要企业集团在股份资本中的比重(%)

年份	三菱集团	三井集团	住友集团	计
1937	3.3	3.5	2.2	9.0
1941	4.3	4.4	2.1	10.8
1955	4.1	3.1	2.7	9.9
1960	4.5	2.9	3.6	11.0
1965	6.0	4.0	4.6	14.6
1970	6.6	3.3	4.5	14.4

三菱、三井、住友这三个集团是人们所熟知的战前的三大财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战前各个财阀总是专营于一定的工业部门，对于开拓新的工业部门却常常踌躇不前②；战后则

① 摘自宫崎义一：《战后日本的企业集团》(《日本经济新闻》社1967年出版)第260—261页的详细统计表。

② 这就是象日产集团那种所谓新兴财阀集团向当时的新兴工业部门——化学及汽车等方面发展的原因。

是只要有一点点技术上的可能性，就竞相涉入新的工业领域，这已成为典型的行动方式。

例如，三井于1955年刚一设立石油化学企业（“三井石油化学工业”），三菱就立即于1956年也设立了自己系统的企业（“三菱油化”）。

换言之，主要的财阀型企业集团，一有需要，就是刚开始发展的独立企业也要吸收到自己集团的组织中来，把所有工业部门都配齐于自己的羽翼之下，仿佛非如此不可似的。①

这种配套主义不仅为主要财阀型企业集团所追求，而且某些生产多种产品的单独企业也追求。作为后者的例子可以举出“日立”来，“日立”在“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势力时，还和“富士通”及“日本电气”相竞争而进入了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那么，为什么在战后的日本会特别普及这种配套主义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占领时期采取了强制排除经济力集中的措施，其结果，可以比以前容易地从头打入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

但是，同时还因为，对于从头打入与最新的工业技术革新相联系的新领域来说，其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力量能在比通常情况更为长期的“怀孕”期间里筹措资本，而这样的能力不管是与财阀型企业集团相结合也好，还是独立也好，都只有大企业才具备。

另外，从主要财阀型企业集团的立场上看来，因为存在着利用外部条件扩大投资以增加利益的可能性，因此扩大其经

① 宫崎义一在上述著作中对于在六十年代加紧推行“配套主义”的产业改组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第268—278页）。

营范围就可以期望主动地得到好处。

如果这样基于配套主义竞相进行投资，其结果，恐怕就要不可避免地出现超过一般预想的需求的过剩投资。如何防止这种过剩投资的出现、以及事后看来如何才使这种竞争性投资合理化，这些问题将在下边加以说明。

行政指导

在第二章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缝纫机制造业获得成功的过程，记述了怎样“该部门由于温情主义的行政指导，在利用技术革新和大量生产的好处、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改进了质量，因而在国内竞争和政府对出口的保护之间取得了理想的平衡”。

政府官员的这种习惯作法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行政指导”，国外的观察家常常把它指为“日本股份公司”的独有特征。最近美国的出版物对“行政指导”下了这样的定义：

“行政指导这一用语不是关于政策、而是关于方法的用语。所谓行政指导就是日本政府为了维持和补充多种具体的以及一般的经济政策而广泛采取的方法”。“行政指导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政府以它认为正确的方式，通过行使影响力来指导企业及个人的行动，包括进行建议和说服。当然，这种说服和建议是由具有下述权力的官员来进行的：即能够在现在或不确定的将来使企业及个人得到（或得不到）诸如贷款、拨款、补贴、承认、减免税、政府订货、进口或外汇许可、批准结成卡特尔以及其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种种结果。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行政指导完全是所谓糖果与皮鞭的策略手腕，那

就不正确了。毋宁说，下述情况对于行政指导这种方法取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认为官员比普通企业掌握更多的知识、经验及情报这种意识的广泛存在，官僚与财界领导人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信念及政治选择等等”。①

负有责任的政府机关或官员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去指示或诱导私人企业或私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但是他们却可以这样作、并且事实上也正在这样作，这就是日本的行政指导这种习惯作法的本质。

这种形式的作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毫无疑问，这种作法在日本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地被国民所接受，而成为一种深深扎下根了的行政特色。而且，这一点还由于退职的官员到产业界就任高职（一般是加入到在其任职期间就曾有关系的企业）这种官员与产业界之间的普遍的关系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这种从政府到产业界的人员移动一固定下来，当然可以想象，现任的官员就会设法使自己将来更能在私人企业里取得有利的地位，而且一旦退职进入产业界以后就要维持和增强政府和产业界之间的关系。”②

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调整

战后日本的行政指导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调整了主

---

① G. 阿克莱和石弘光：《财政、货币及有关的政策》，见上述H. 帕特立克和H. 罗索斯基合编书，第236—237页。

② P. H. 特雷捷斯和铃木雪男：《日本的政治、政府和经济增长》，见上述H. 帕特立克和H. 罗索斯基合编书，第785页。

要工业部门的投资计划。如上所述，在一些工业部门里曾经存在着过分扩大生产能力的倾向。在新设备的建设实际进行之前，如果没有什么力量加以控制，进行投资的企业就肯定要因市场问题而受到沉重打击。

为此，行政指导就在下边以确切而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的两个阶段里进行干预。其中第一个阶段可以比喻为日本麦田的习惯作法——为防止根部陡长、促进麦苗发育的"踩麦苗"。第二阶段可以比喻为"山中小房"，其作用是事先知道它的存在比不知道它的存在更能使登山运动员富于冒险精神。

"踩麦苗"阶段的投资调整有如下各种方式：(1)象水泥及合成氨部门那样，由通产省直接进行行政指导；(2)象钢铁部门那样，在通产省"产业构造审议会"的"产业资金委员会"下设立"特别小委员会"；(3)象石油化学、纸浆、合成纤维那样，通过官员和产业界领导人随时举行个别的会谈来加以调整；(4) 象电力、石油炼制部门那样，依据特别法律容许扩大生产能力，等等。

上述情况之中的头三种带有行政指导的性质，而包括第(4)种在内的各种方式的投资调整都是限制企业竞争的，其后无论产生什么样的能力过剩或能力不足，政府都必须负有一部分责任。

从这种情况之中当然要出现在投资调整的第二阶段（山中小房）上的行政指导。其方法就是当看到生产能力的实际扩大过了头的时候，通产省便劝告该行业的所有企业共同协调来降低开工率。

近年来，这种作法更因通过"公正交易委员会"承认组织

萧条卡特尔这种法律手续而得到了加强，有关企业可以根据这一措施来商定产量及销售量，或者由双方商定销售价格及开工率来限制竞争。

不论是何种情况，各个企业都能安心地提出投资计划，就象登山运动员尽管天气突然恶化却知道有着避难小屋总在保护自己一样；否则，其投资计划就会令人觉得是过分野心勃勃的。

毫无疑问，这些温情主义的照顾，表现出了一种促进整个制造工业部门都大量进行投资的倾向。当然，由于投资又引起投资，其结果使得即或是过分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事后也觉得是恰到好处的。日本钢铁部门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就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

钢铁工业的急剧扩大

在日本的平均每人收入恢复到战前（1934—1936年）水平的1955年，日本的粗钢产量仅为941万吨，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为1亿零617万吨和4,527万吨。但是，到1974年，苏联的产量增加了二倍，为1亿3,600万吨，美国增加了25%，为1亿3,220万吨，日本则增加了11.45倍，达1亿1,713万吨了。

由于通产省通过"产业资金部会"的"钢铁小委员会"搞了行政指导，使日本钢铁工业的这种显著的扩大得以秩序井然地进行。每隔五年制定一期的所谓"合理化投资计划"，其扩大生产能力的计划投资总额通过官员和产业界代表的调整协商，在有关竞争的企业之间大体上进行了完满的分配。上述

每隔五年一期的计划投资额如下表所示，是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大的。

第17表　钢铁的计划投资额(亿日元)

1951—1955	1,282
1956—1960	6,227
1961—1965	11,460
1966—1970	22,428

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以及其后的时间里，钢铁工业的技术革新极为活跃，其形式是重点扩大高炉和轧钢机械等基础设备的单位规模。

到 1975 年 10 月，世界最大的高炉是苏联克里沃罗格钢铁厂的高炉，炉内纯容量为 5,026 立方米，但是全世界在此以下直到第二十位的高炉中，日本就占有 13 座（第二位、第三位、第六位、第七位、第八位、第九位，等等），许多人知道了这种情况也许会大吃一惊的。① 在采用连续铸钢法方面，日本的钢铁工业也居现在世界的首位。

随着或多或少处于互相竞争关系之中的六大钢铁公司（八幡、富士、川崎、神户、住友、日本钢管）② 的基础设备的单位规模不断扩大，通产省的官员和主要贷款银行由于考虑到追加投资异常之大，从而担心在这些企业之间可能出现过分的竞争。

面对这种事态，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大胆的行政指导、即提

① 篠原三代平在上述著作（第258页）中所引用的“日本钢铁联盟”的资料。

② 根据《幸福》杂志编：《世界最大一百家公司要览》，上述六家公司在1963年的位次分别为：八幡为第三十一位、富士为第五十七位、日本钢管为第六十五位、神户制钢为第七十位、住友为第八十六位，川崎在100家大公司以外。

议让在钢铁部门中居第一和第二位的八幡和富士进行合并。据这两家公司的长时期的主要贷款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当时的总经理中山素平先生讲，从1966年年中起就开始暗中酝酿合并的事情了。

曾经推动过这种合并的中山素平先生还讲当时的主意是：如果让大型高炉今后更进一步竞争下去，就难免要造成国民经济的浪费；而如果让相互竞争的公司数目更少一些的话，就会使当时已开始进入实用阶段的各种技术革新更加合理地引进到钢铁工业中去。这种想法是以1965年的萧条为契机而产生的，但在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强烈起来了。①

通产省的官员明确地同意这一判断，战后日本最大的合并计划便秘密地搞起来了。这种动向在1968年4月被报纸揭发出来以后，便普遍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针锋相对地反对这一作法。

但是，由于通产省官员强有力的行政指导和中山素平先生顽强而高明的工作，其结果，终于在1970年3月实现了八幡与富士的合并，从而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司在1975年生产了3,252万吨粗钢，远远超过了占第二位的美国钢铁公司的2,395万吨的钢产量。

隐蔽的补助金

行政指导当然并不仅仅用来调整投资。例如，在价格统

① 参见《经济学人》（1976年7月6日号第79页）的《对战后产业史的证言》。

制的问题上，为了赋与政府以明确的法律权限来统制价格，于1973年12月拟出了一项特定的法律——“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并在国会通过。这项法律可以比喻为“传家的宝刀”，这把以其锋利而闻名的“宝刀”即使不拔出鞘来，仅仅以其存在就能加强政府行政指导的威力。

而且，实际上这一法律虽然是以石油制品价格、其他50到60种基础商品的批发价格和148种商品的零售价格为对象的，但是可以利用该法的权限来进行价格冻结的却只有丙烷、煤油和卫生纸。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却都是单靠行政指导来统制的。另外，日本银行在提供中央银行信用时所采取的“窗口指导”，也是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行政指导的习惯作法。

实际上，在战后日本工业政策的历史中，由于巧妙地行使行政权力使特定的产业得以克服严重危机的情况是非常多的。这种事例之一，就是在1953—1954年萧条以后的时间里向造船业提供的隐蔽的补助金。

当时对造船业来说，出口被认为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从价格和成本的关系上来看，却处于不利的状态。虽然如此，但如果直接给予补助金也显得太刺眼了。因此，就采取了向出口船舶的造船业主分配食糖进口许可证这种行政措施。

当时由于可以使用的外汇很缺乏，必须严格限制食糖的进口，其结果就使国内市场的食糖价格涨得非常高。当时在通产省官员的头脑中浮现的方程式中的变数有以下三个：(a)为使日本的船舶具有竞争力而需要的补助金的数额；(b)能够适用于国内市场的食糖零售价格；(c)食糖进口商能够赚

得的佣金。

接着，便推算出(a)的总额，再用(c)来除，进而算出食糖的“必需”进口量，然后就按照这个数量向船舶的出口商分配进口许可证。就这样，船舶的出口价格便降低了20%—30%。

据说，通过这种办法付出的隐蔽的补助金在1954年到1955年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就达100亿日元。这一金额是如何之大，只要和大约相同时期的“日本贸易振兴会”的年预算(只有五亿日元)相比较，就会立即清楚了。①

尽管由于日本把行政指导广泛地用于多种目的，而使得国内外的批评逐渐强烈起来，但是通产省还是把它作为避免官僚式的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并且避免财界与政府之间产生不和的手段，而一直加以维护。②

由于在日本传统地存在着讨厌公开按照法律手续处理事情的社会风气，因此便养成了日本特有的那种通过点头扳指的、非正式的、半随便的说服来解决问题的习惯作法。

庞大的先行投资

常常有人说，比起筹措资金和劳动力来，购置土地是极其容易的事情。制造工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农业相比较，大得不可同日而语，这完全是事实。例如，在1970年大约574万

---

① 林信太郎先生在《对战后产业史的证言》(1976年6月22日号《经济学人》杂志第80页)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林信太郎先生当时在通产省负责农产、水产品(包括食糖)。因为这种补助金措施非常有效，使得“出口”的船舶有许多实际上被日本的海运公司买进了。

② 见上述G.阿克莱和石弘光合著书，第239页。

公顷的农田的毛产值为4兆5,790亿日元（平均每公顷约为80万日元），但是108,566公顷的工厂用地的毛产值却为57兆8,150亿日元（平均每公顷约为53,200万日元），两者平均每公顷的比率为1:665。

因此，人们可能想，只要把农田转用到工业上去一点点，比如转用2%，就将使工厂用地立即增加一倍。

实际上，在1970年国内稻米生产陷入慢性过剩状态的时候，农林省曾提出让33万7千公顷的稻田休耕，而给耕种的农民以补偿。

而且，当时农林大臣仓石还明确表示，根据对长期计划的研究，确信将来可以将20万公顷的稻田永久地改用于其他目的。从算术角度来看，这便意味着没有多大困难，就可以把工厂用地增加两倍。

但是，问题却并不如此简单。如果说工厂用地必须满足各种效率方面的条件的话，那么就必须符合以下多种要求：诸如能够得到适当的工业用水、从运输的观点来看要便利、接近劳动力的供应地，等等。

即使碰上了好运气，恰巧有块符合这些条件的稻田要休耕或者决定永久停止使用，那么使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买卖价格问题还是严重的障碍。

拥有土地的农民所要求的价格，往往不仅要补偿他将丧失的、将来能连续从其土地上获得的收入，还要能够补偿他自己改行所需的费用，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很快便使人看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是在某一区域搞填海造地，即使加付渔业损失补偿费，也是比较合算的。

随着海洋运输设施的引人注目的技术改进（如利用自动装卸设备向自动化仓库以及大型专用散装运输船装送器材或从中卸运器材），在附近有非常合适的港湾的海岸建设工厂，对于象钢铁业那样经常搬运大型物件的工业来说，填海造地在大幅度降低成本方面显然是更为合算的。

如果想得到工厂用地，一般的惯例和普通的作法是由私人企业独自根据本身的判断来展望前途，选择一定的地方，再签订购买某一区域的合同。

但是，战后日本在上述情况下，政府便通过填海以及修建港湾、道路（从高速公路到通往工厂的专用路）这种对产业基础的整备，为填造建厂用地进行先行的公共投资。政府承担这部分工作的结果，就可使私人企业把获得工厂用地的成本控制到最小限度。

1953年，国会通过了名为"港湾整备促进法"的法律，决定赋与运输大臣(常常负责对港湾的开发)以计划和批准填海事业的权限，其具体执行则规定由都、道、府、县的知事负责。但是，计划本身却是以国家的规模来实行的，决定了全国计划填海造地的总面积以及对各指定港湾区的分配。当然，填海造出的土地最终还要卖给需要工厂用地的私人企业，但是最初的填海费用却规定由能够通过发行地方债和向"资金运用部"借贷来筹措资金的地方公共团体来承担。

制定全面填海计划所采取的方法是相当有趣的。对于这一点，还是通过1969年（当时全国已经填海27,184公顷）所制定的从1971年到1975年的五年计划的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吧。当时是采取下述程序来确定填海的最后计划数字的：

（1）预计从1969年到1975年期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将为10.6%，197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为95兆8,600亿日元（1965年价格）；

（2）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推断出国民生产总值和制造业的毛产值之间在量的关系上，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按此推算，1975年制造业的毛产值将为96兆日元（1965年价格）；

（3）制造工业的土地生产率在1965年为每年每公顷33,000万日元，到1975年按稳妥的估计将提高到49,800万日元（1965年价格）；

（4）用（3）项中的49,800万日元去除（2）项中的96兆日元，可以得出192,900公顷这一数字；

（5）从上述192,900公顷之中减去1965年当时已经成为工厂用地的97,500公顷，就算出了从1965年到1975年期间所要增加的用地面积即95,400公顷；

（6）并不是所有的工厂用地都以填海的办法来解决，在工厂用地之中填海造地的比率在1963年为46.2%，1966年为45.5%。因此可知，相当于上述所需土地总面积95,400公顷的45%的42,900公顷的土地必须通过填海造地来解决；

（7）除原定工厂用地以外，还要补充上公共用地，为满足这种需要，总面积便将增加35%，所需填海造地的总面积将增至58,900公顷；

（8）其中估计有14,700公顷将在1966年到1970年期间填完，那么从1971年到1975年期间的填海造地计划面积将为44,200公顷。但是其中约有10%是将由私人来进行的，因

此，在这五年期间港湾区当局必须负责完成的填海造地面积约为4万公顷。

在订出上述计划的时候，估计填海事业的费用平均每公顷为4,500万日元，其价额大致相当于附近农田价格的二分之一以下。

对填海造地的先行公共投资从1954年以后就以这种方式向前进展，它对解决1955年以后的经济急剧扩大时期的工厂用地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以五年为一期完成的为工业填海造地的面积如下：

1959—1960年	2,321公顷
1961—1965年	11,670公顷
1966—1970年	13,287公顷

如上所述，1971年到1975年期间的计划数字曾定为4万公顷这一高水平。但是，在1970年左右，对环境问题的关心显然强烈起来了，这便刹住了美丽的海滨向工厂用地的转变。其结果，1971年到1975年期间实际完成的填海面积只有12,512公顷。

对于今后能否获得更多的合适的工厂用地的问题，我想现在正是要求政府及产业界迅速改变想法的时候了。

对企业的特别减税免税措施

日本法人企业的租税负担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为轻，这一点是一般公认的。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条件背后，存在着日本经济的两个另外的特点。

其一，就是日本的租税制度对于整个纳税者来说，其负担

都是比较轻的。从包括国家税和地方税两者在内的租税收入对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来看，1972 年日本为 21.2%，但是挪威却为 45.7%，西德为 36.0%，法国为 35.8%，英国为 34.7%，美国为 28.1%。①

这种比较低的租税负担率是战后日本典型的特点之一，它在 1955 年到 1974 年期间不过稍有提高而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第一，因有宪法第九条，限制了国防计划的扩大②；第二，至少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对于把社会福利计划的内容提高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持消极态度的。

可以从日本法人企业的租税负担比较轻这个背景中发现的第二个特点，是日本法人企业的资本构成显著地依赖从外部借贷。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说明，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计算法人税的课税对象—利润额之前，准许把借款时付出的利息作为经费支出扣除掉。

下述有关制造业大企业的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情况，这里虽然是 1974 年的数字，但却大致反映出了日本的典型状况：

(A) 折旧 1 兆 7,700 亿日元

(B) 金融费用 2 兆 3,100 亿日元

(C) 纳税前利润 1 兆 6,930 亿日元

---

①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财政收入统计》(1965—1972 年)。

② 宪法第九条的条文是：“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D)税款 7,550 亿日元

(E)纳税后利润 9,390 亿日元

$\frac{(D)}{(C)}$　　44.6%

$\frac{(D)}{(B)+(C)}$　　18.9%

资料：日本银行：《国际比较统计》，1976 年 5 月版，第 11 页，这里引用的数字是 337 家制造业主要企业的合计。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日本企业的资金筹措明显依赖外部资金，因此从总的经济观点来看，在法人企业所用资本带来的收益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向法人直接征税的对象。

除了这种一般的有利环境以外，还出于政策上的考虑而对私人企业实行了一系列减税免税措施。在政府官员和经济界之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主张，就是要灵活运用税收制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1949年，"肖普税制调查团"① 来到日本，对于日本税制之中的五花八门的特别措施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于 1950 年制定出了一系列合理而系统的税收法。但是，日本政府在 1952 年获得独立以后便特别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目的，不失时机地相继实行了所谓"租税特别措施"。

最初实行的措施有：缩短重要工业设备的折旧期、对出口收入实行特别扣除、对出口贸易损失准备金实行免税、降低利

① "肖普税制调查团"，指1949年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肖普为首的"日本税制调查团"。当时美国占领当局曾根据该"调查团"的建议对日本的税制进行了"改革"。

息分红的税率等等。

从明显依赖减税免税措施的最初时期到后来的二十年期间，租税特别措施的数目增加得简直不胜枚举。为了举例说明，在这里把1975年存在的减税免税措施的一部分——实行免税的准备金一览表列示如下：

1.呆账专款；

2.退货调整专款；

3.奖励专款；

4.退职金专款；

5.特别修缮专款；

6.产品修理及担保专款；

7.价格变动准备金；

8.开拓海外市场准备金；

9.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

10.自由贸易地区投资损失准备金；

11.中小企业改善结构准备金；

12.防止金属矿业矿害准备金；

13.特定铁路工程折旧准备金；

14.原子能发电工程折旧准备金；

15.特定煤气管道工程折旧准备金；

16.计划造林准备金；

17.防止污染准备金；

18.买卖股票损失准备金；

19.缺水准备金；

20.异常危险准备金；

21.补偿违约损失准备金；

22.证券交易责任准备金；

23.商品交易责任准备金；

24.电子计算机买回损失准备金；

25.计划担保准备金；

26.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展出准备金。

（上述准备金的详细内容在大藏省财务协会1975年出版的《日本税收大纲》第87—94页有说明）

除了上述这些免税准备金条款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减税免税措施，如缩短折旧期、对国内外新矿床的探矿费予以特别扣除、对旧帐面价格的财产继承缓期征税、对特定事业资产的更新缓期征税、对出让征用财产的收入实行优待税、对出让土地的收入予以特别扣除，还有与1971年日元升值有关的一些特别措施、对按一定方式计算的收入的一些特别规定等等。

减轻了多少负担

从经济分析的观点来看，有三个问题是特别有趣的，即：（1）这些特别措施究竟使法人所得税的实际税率减低了多少？（2）毫无疑问，大企业比中小企业更能充分利用这些特别措施，那么大企业从中获得的差别性利益究竟有多少？（3）准确地说来，这些措施对于促进企业的投资和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在回答头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最好是看一看下边的研究情况，在这个研究里就法人所得税的实际税率比名义税率

减低多少这个问题对日本和美国作了比较。

在这个研究里，对 1965 年到 1972 年各年的情况都作了比较，就 1972 年来说，其数字如下：

	上限的名义税率	实际税率
日本	48%	20.1%
美国	51%	27.1%

这里列举的数字在上述作为研究比较对象的八年期间里是完全稳定的，这本书(《日本税收大纲》)的作者们评论说："日本实际上朝着这个方向(即利用减税免税措施来鼓励私人投资这一方向)恐怕比其他一般国家都前进得更遥远"。①

但是，在上述研究里，是把"扣除折旧专款前的利润"作为计算"实际税率"的基准来使用的，并且好象主要由此得出"实际税率"比"上限的名义税率"低的数字，在这一点上是过于简单了。

关于特别措施使租税减轻的程度，最近东京都的特别专家委员会作了比上边远为详细的研究，对于租税减轻的程度，无论在比率方面还是在绝对额方面都作了估计(对于"名义税率"及"实际税率"双方都使用同一征税标准)。②

1974 年法人税的减免绝对额，估计在法人所得税方面为 1 兆 7,900 亿日元，在应向地方公共团体交纳的法人税方面为 7,930 亿日元。前者的减轻率应和 1974 年实际交纳的法人

---

① J.A.裴许曼和贝塚启明：《租税论》，见上述 H.帕特立克和 H.罗索斯基合编书，第 343 页。

② 东京都新财源设想研究会：《大城市税制中的不公平税制》(1975 年出版)及该研究会：《不公平税制和财政结构的改革》(1976 年 8 月出版)。

所得税金额（5兆8,160亿日元）相比较，总的减轻率为30.8%。

在这里所引用的研究中，把每个特别措施所减轻的租税按着各个项目一一地加以推算，进而按企业的规模制成表格以表示减轻程度的差别，由此实际上就得出了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仅用大藏省正式发表的资料进行研究，那么可推算出1974年规模最小的企业(资本在100万日元以下)的租税减轻程度仅为4.5%，一般随着规模的扩大其比率也提高，规模最大的企业(资本为100亿日元以上)为42.1%。①

因为在日本的法人税制之中包含有累进的因素，所以人们也许会以为，企业规模越大，那么就要从其纯收入中拿出比小企业更大的部分来纳税。但是，正如我们从上述租税减轻程度因企业规模不同而不同的情况之中可以推测出来的那样，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有人更直接地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研究。

植草益先生主要根据正式的统计，对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实际租税负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根据他的分析，1971年法人所得税的实际负担最大的是资本在1千万日元到5千万日元之间的中等规模的企业（为30.7%），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这一比率也稳定地下降，资本为100亿日元以上的规模最大的企业竟下降到21.8%。②

---

① 《法人企业的实态》。

② 植草益：《剖析法人税制的实态》，《东洋经济新报》1973年8月4日号，第52—59页。

特别措施的效果

第三个问题是租税特别措施对促进企业的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准确说来究竟有多大，回答这个问题更为困难。这些特别措施法令通常都得到经济界的强烈支持，常常是不管经济学家的竭力反对而强行在国会通过，这一事实恐怕可以说是上述措施至少对有关部门来说有某种帮助的客观证据。

而且，在交纳法人所得税时竟得以减轻 30%这种情况本身也可以说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措施。此外，还有按着“振兴出口”、“设备近代化”、“增加内部保留来加强企业体质”等不同目的分别统计的有关减轻租税方面的数字，也是可以利用的。①

当然对于这种影响还可以从具体事例来研究，比如对于生产出口商品的厂家来说，同意扣除其出口总额的 3%这种减税规定所带来的好处，就相当于其出口纯营业收入的80%。这种规定曾在 1953 年到 1965 年期间实行过，但到 1965 年因直接违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于禁止出口补助的规定而废除了。

租税减免措施的突然废除，会给过去依赖租税减免措施而生存的企业带来暂时的困难，这是十分可能的。这个问题与研究日元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有着某些相似。

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只想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日本的出口产业到1965年已经十分巩固，可以放弃迄今已完成了使

① 见植草益上述文章，第57页。

命的上述那种形式的特别"脚手架"了。

上述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最后结论说,"关于租税特别措施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在大部分领域里尚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①他们所指出的各种理由是密切关联着诸如促进家庭储蓄的租税特别措施和私人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的,而在这一点上,的确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就对企业投资(如对钢铁、机械等一定的产业部门的投资)以及出口(如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及六十年代初期那样的时期里)方面的影响来说,租税特别措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

低利率政策

一旦了解了以上反复说明的那种日本企业在筹措投资资金上明显依赖外部资金的情况,人们就容易认识到利率水平的决定性重要意义了。

在自动分配投资资金方面,利率作为有决定意义的市场变数所能发挥的机能是人所共知的——即通过供求关系的自然相互作用,提高利率则可以控制过分的投资需求,降低利率则可以活跃新的投资。

但是,战后日本实际上出现的情况却不是通过市场利率的自由变动来调整供求关系的,而是基本上固定地把利率体系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同时通过(1)日本银行、(2)主要的商业银行、(3)日本开发银行等特别银行、(4)财政投资贷

① 上述J.A.裴许曼和贝塚启明合著书,第361页。

款当局等方面的裁断来分配资金的。而且，为了减轻特定产业的利息负担，还按着制度给予补助金。

日本银行所采取的金融政策上的主要手段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窗口指导”，它与政府对整个经济问题的政策相联系，是上述行政指导的“金融政策版”。这种手段使用于对各个银行的总放款额给以一定数量上的限制，当各个银行来到日本银行的“窗口”时，这种指示是以“单纯暗示”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它却总是被接受的。

在各个银行所能提供的贷款从行政上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各个银行对其贷款对象就不得不实行某种形式的分配。这种时候，特别是在紧缩金融时期，商业银行当然要优待与之有着财阀型的传统关系的借户了。

各个银行的贷款总额不仅为日本银行的“窗口指导”所限制，日本银行还经常发出非正式的指示，以表示鼓励贷款或要求控制贷款，比如1973年就曾发出指示，要求注意贷出的资金“用于投机购买商品和土地”。

对于另外两个资金供应机关——特别银行及大藏省来说，资金的供应是基于特定的政策上的考虑而采取分配方式的，至于利率方面的考虑只是第二位的。这从上述机关的性质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财政投资贷款当局所能处理的资金量达到很大的规模。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资金运用部的债务，在一般的年头里邮政存款占其中一半以上。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把它与日本全国银行的存款额加以比较的第18表中看得出来。

第18表　资金来源（单位：10亿日元，年末数字）

	1965年	1975年
全国银行存款	20,653	92,921
资金运用部的债务	4,754	40,556
邮政存款	2,573	22,958

从第18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比起活期存款来定期存款的性质更为强烈的邮政存款现在几乎达全国银行存款额的四分之一。这种资金全部寄存于大藏省资金运用部，根据每年的财政投资贷款计划进行使用。

这样分配下来的资金，其大部分被用于住宅建筑（约20%）、道路建设（8—10%）、运输通讯（12—14%）以及修建其他社会设施等公共目的，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于向基础产业投资（1960年为13.6%，其后则下降了，近年来约为3%）、振兴出口以及经济合作（10%或10%以下）的。资金运用部放款时的利率为6.5%，偿还期限为二十五年，这一利率当然是低于商业银行放款利率和公司债的利率的。

很明显，所谓"低利率政策"实行上是靠叫作"窗口指导"的特殊金融手段和能够通过政府金融机关或准政府金融机关筹措大量资金这两个方面来支持的，其性质显然大有直接分配资金政策的色彩。

就这样，得以大体固定地维持了相对的低利率，这对日本在最近二十年期间保持旺盛的投资需求是起了作用的。阿克莱和石弘光两位先生在其合著的书中写道："与设备和库存的实物投资成本相比较，低利率可以提高上述投资收益的现时价值。但是，这种投资量是受（信用分配额的）限制的。这

是为了避免投资的增加会带来投资收益下降(或成本提高)以至使企业利润下降到相当于最低供应价格的程度。实际上,这恐怕就是日本投资需求旺盛的最基本的原因”。①

创造投资资金的政策

在利率水平方面,就和必须从它与资本的预期收益的关系上加以判断其高低一样,还有一个为了使大量资金充分而顺利地流向金融机关,应该把利率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就一般的感觉来说,储蓄量受利率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

但是,事实上却有非常多的流动资金通过各种金融机关而从家庭部门流入企业部门,一想到这种情况,就会令人惊问“何能如此?”。第19表把日美两国有代表性的大银行在六十年代中期典型的一年里的放款利率及经费比率作了比较。

第19表　银行经营比率比较(%)

	日本	美国
放款利率	7.00	5.61
存款成本	6.52	3.98
存款利率	4.12	1.86
经常经费	2.40	2.12
利差	0.48	1.63

资料:大藏省银行局金融制度调查室调查,1966年下半年数字。

根据第19表的数字,日美两国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存款利率,这一点可以主要由下列事实来加以说明——即美国活期

① 上述G.阿克莱和石弘光合著书,第205页。

存款约占总存款额的三分之二，相反日本却仅占1%。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的银行可保持有更长期的资产。

但是，与此同时，所用总资金的利差却被缩小了，美国为1.63%，日本仅为0.48%。就日本城市银行来看，这种利差近年来有所变动，从六十年代中期到1971年大体上是增大的，其后又缩小了，到1975年变为0.5%。①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银行作为营利单位过去的经营失败了。事实上，由于经营规模在过去二十年里以比国民经济的名义增长率还高的速度急剧扩大②，其结果尽管利差小还是充分保证了营业的兴隆。

尽管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金融机关的相对扩大，享受利息者将无痛致死"，但是私人的利息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还是越来越大。在第20表里把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利息收入的比率与其他种类的收入作了比较。

第20表　收入的分配(%)

	1951	1961	1974
农林水产业私人业主收入	22.7	11.3	4.9
私人的利息收入	1.4	4.6	7.8
私人的红利收入	1.1	1.8	1.2

资料：经济企划厅：《国民所得统计年报》，1976年版，第60—65页，年次为会计年度。

---

① 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报》(1975年版)，第131—132页。

② 1956年年末城市银行贷款累计额为1兆4千亿日元，相当于同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9兆7千亿日元)的14.4%，而到1974年年末贷款累计额便增至32兆3千亿日元，其规模达名义国民生产总值(132兆5千亿日元)的24.2%。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次产业私人业主收入的相对比重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激烈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的利息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却由 1951 年的 1.4%迅速增加到1974年的 7.8%，而这一期间属于私人的红利收入却大致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

总而言之，必须再次强调指出，所谓“低利率政策”，归根到底就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即利用群众要把收入中的相当部分通过银行存款或邮政存款的形式储蓄起来的倾向，在作为制度固定下来的利率体系中，来向企业分配投资资金的政策。

在分析战后日本投资旺盛的时候，谁也不能低估各种金融机关所起的重要作用。

如果以西欧的发达国家为基准，可以发现在日本的金融制度中有许多日本独有的特色。因此，现在越来越有必要对日本经济的这个侧面加以彻底的调查了，而本节仅起个开头的作用而已。

水电补助金

和金融费用不一样，工业的用水用电却因行业不同而千差万别。对于某些产业来说，水电费用在总成本之中所占比重比利息还大，因此政府极力压低工业的水电费用的政策在某些特定的制造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21表统计的是水电方面的费用在有代表性的制造工业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该表中的数字因为是制造过程最后阶段的比率，所以显然是不精确的。如果利用 1961 年的“投入产出表”

进行更为精确的估计①，那么，例如在粗钢的生产成本之中，电力所占的比重便为18.96%，水泥为8.54%，合成纤维为17.95%。②

第21表　水电费用占生产总成本中的比重(%)

	水费	电费
生铁	0.74	0.55
棒钢	0.66	0.62
薄钢板	0.48	1.13
水泥	0.44	4.72
硫氨	7.35	34.42
尿素	2.58	2.78
粘胶短纤维	1.69	0.36
纸浆	4.63	9.26

资料：佐藤武夫：《水的经济学》，1965年版，第191页。

工业用水量大体上按比例随着工业生产指数的提高而增加，1962年平均每天为3,590万吨，1972年便增加到1亿150万吨。但是，其供应来源却如第22表所示，在上述十年期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第22表　水的供应来源

	成本 1962年 (每吨、日元)	1962年 用量 (千吨)	1962年 构成比率 (%)	1972年 用量 (千吨)	1972年 构成比率 (%)
计	3.34	35,931	100.0	101,475	100.0
公共自来水					
工业用水	3.36	2,201	6.1	11,491	11.3
城市自来水	16.22	3,029	8.4	3,530	3.5

① "投入产出表"，指把各经济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产品在各部门间的分配情况加以系列化而制成的表格。此表为美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所始创。——译者

② 参见"日本产业结构研究会"根据1961年"投入产出表"对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分析。

地面流水	1.58	6,237	17 4	8,257	8.1
地下流水	1.93	2,583	7.2	3,163	3.1
井　水	2.83	11,046	30.7	15,243	15.0
其　他	1.96	671	1.9	884	0.9
回收水	1.95	10.165	28.3	58,889	58.1

资料：1975年11月"产业构造审议会"的"工业用水基本政策小委员会"提出的《地下水政策的基本方向》第3页。1962年平均每吨成本数字采自通产省编制的《工业用水统计》，总平均成本为加权平均。海水不包括在本表之内。

相对说来，回收水的用量显著增加，其他方面、特别是井水则减少了。这是由于政府为了避免工业集中地区地基下沉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而有意控制使用地下水这种政策造成的。

为此目的，工业用水的供应价格就被定在与使用井水的成本大体相同的水平上，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在建设自来水设施和最后卖水两个阶段上提供补助金的因素。建设阶段的财政补助规模估计约占资金费用的20%，补助金对供应价格的比率近年来虽然逐渐下降，但还在17%到25%之间。①

就水来说，工业用水和饮用水的生产成本是有显著差别的，而电力则不同，无论是工业用电还是家庭用电都是同一质量的东西。在附属设备的费用方面，向大用户供电显然比向一个个家庭供电要便宜得多。

但是，以1962年为例，家庭用电量比重为18.7%，而在电费支付额中家庭用电所占比重却为35.9%，这种情况显而易见是因为在家庭用电和工业用电之间存在着某种交差补助金造成的。

计算电力工业的成本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对交差补助金

① 参见自治省编：《国营企业年鉴》(1976年版)。

的规模的估计也难免形形色色。但是，根据六十年代初期一般为人们所接受的估计来分析，家庭用电的电费水平要比实际成本高 6.4%，工业用电的电费水平要比实际成本低 4.9%。①在第 23 表中，把 1962 年日本和英国每千瓦的电费作了比较。

第 23 表　电费比较

	日本 （日元）	英国 （便士）
A　家庭用电	11.95	1.665
B　工业用电	4.59	1.349
C　$\frac{B}{A}$（%）	38.4	81.0

资料：统计研究会：《公共费用的国际比较及其背景》，1965 年 3 月出版，第 19 页。

实际上，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这种交差补助金的存在就引起了舆论的批判，在 1974 年重新规定电费时，大企业的电费提高了 84.8%，而家庭的电费提高的幅度较小，只为 28.6%，两者的差距大为缩小了。

但是，就在这次重新规定电费以后，大企业的电费水平平均每千瓦仍然只为家庭电费的 52.9%。对于现在是否仍然存在着交差补助金的问题也许有着争论的余地，但是在下面的问题上却是没有置疑的余地的——即在 1974 年以前的整个高速增长时期，交差补助金对于消费电力多的产业起了重要作用。

推迟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

日本在 1963 年和 1964 年先后接受了“关税及贸易总协

① 见佐藤武夫上述著作，第 193 页。

定”的第11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8条规定①，在1964年加入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换言之，日本的商业政策在关于直接或通过汇兑许可实行数量限制的非关税壁垒方面发生了转变，1964年可以说是个转折点。

但是，日本经济在1964年以前由于一方面继续利用劳动力比较廉价这种明显的好处，另外在技术进步方面追赶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其大部分制造工业部门都已获得了足以经得起来自国外竞争的能力。

回顾起来，日本政府一边经常考虑到“不要过早也不要过晚”、一边推行自由化的这种巧妙的掌握，令人不得不佩服。

实际上，在1961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务理事普利德曼先生因年度审查到东京的时候，就已经公开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8条国了。但是，日本却推迟到三年之后才接受了第8条。

在这期间，日本连续把应该实行自由化的商品一个一个地、慎重地挑选出来，以便使国际竞争对特定产业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限度。从1960年到1964年秋天这一时期，在日本一般称为是“贸易自由化的第一阶段”。自由化的比率从1960年4月的41%缓慢但却稳步地提高，到1964年10月达到93%。虽然为保护国内生产者仍然实行关税政策，但是到1965年10月还是采取了成品小汽车进口自由化这一重要措施。

---

①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11条规定“不得因国际收支方面的理由而限制进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条款第8条规定“不得因国际收支方面的理由而实行汇兑限制”。凡接受并承担上述义务的国家，便分别称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11条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国。——译者

由于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承担了国际义务，日本已经原则上不能依靠从数量上限制贸易的措施了，同时对于经常交易的汇兑限制措施也不得不废除了。但是，对于某些种类的进口商品却允许作为例外，这些商品便被指定为“残余(进口限制)项目”。日本的自由化的第二阶段就是要减少这种“残余项目”的数量，不过到七十年代初期尚未进入到这个阶段。

但是，六十年代后半期的特点却是在所谓“肯尼迪回合”协定的促进下出现了分阶段降低关税这种普遍的倾向①。日本在1968年5月接受了这个协定，并逐渐采取措施在其后约三年之内把关税水平降低了30%。下边通过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从价关税的变化，来具体地说明一下这个过程(第24表)。

第24表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下降情况(%)

	对汽车的关税率			对零部件的关税率		
	小型	大型	大型卡车	发动机	车身底盘	轴承
1968年1月1日	40	35	27	30	30	25
1969年1月1日	36	28	21.6	30	24	20
1970年1月1日	34	17.5	18.9	30	21	17.5
1971年1月1日	20	17.5	18.9	30	18	15
1972年1月1日	10	10	10	15	15	12.5
1973年1月1日	6.4	6.4	8	12	12	10
1974年1月1日	6.4	6.4	8	6	6	6

资料：根据日产汽车公司《汽车产业便览》1976年版第371页制成。

---

① “肯尼迪回合”，指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倡议之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中就普遍大幅度降低关税问题所进行的谈判。此谈判开始于1964年5月，1967年5月才达成协议，决定在5年之内分5次将工业品的关税平均降低32—34%。——译者

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日本是在1961年左右开始感到来自国外的强烈压力的，那时候日本的汽车工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因担心其前途，而在不断地要求通产省继续采取各种保护措施。① 但是，从前边的第9表中可以看出，汽车工业从1960年以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无论是1965年的自由化还是后来的降低关税，那些随之而来的困难都被它很容易地克服了。

六十年代后半期，对于日本来说，降低关税和外资流入自由化问题成了经济界和政府机关强烈担心的中心，同时也是贸易自由化暂停进展的时期。1966年4月1日"残余（进口）限制项目"的数量为120种，第二年实际上转为增加了，到1969年才又回到了1966年的120种的水平。

但是，从1969年以后"残余项目"的数量却稳步减少，到1976年3月终于缩减到27种了。这些"残余项目"的构成主要是农产品以及电子计算机、皮革制品等极少数制造工业的产品。因此，七十年代的前半期一般被称为贸易自由化的第二阶段。对于直接投资形式的外资流入的自由化问题也调整了实行的时机，以使它对国内的幼小产业的打击减少到最低限度。

不早不晚

日本持续被占领了七年时间，在这期间不但在决定主要政策方面，而且在提供经济援助和巩固美国的经济渗透的基

① 参见今井善卫先生：《对战后产业史的证言》(《经济学人》1976年9月14日号)，这位先生曾任通产省通商局长。

础方面，美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异议的。在恢复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当然还存在着这种依赖美国的遗痕，美国企图向日本输出资本的压力是很强烈的，其形式或是要建立子公司，或是要成立合办企业。

关于后者的例子，在叙述日本缝纫机工业的发展时已有所涉及。从那时一直到 1963 年 7 月，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只要不答应不向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寄送利润，就不允许外国资本建立企业。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和电子计算机公司由于同意接受这种限制，因此在战后不久便在日本建立了子公司。但是，这种限制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 8 条相抵触。日本在 1963 年决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 8 条以后，便不得不废除了禁止向国外寄送利润的规定。

从此以后，日本可以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唯一方法就是根据“外资法”进行审查了。在 1964 年 4 月日本加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时候，又进而承担了尽量迅速实现资本交易自由化的义务。特别是美国政府过去一直期望这种时机的到来，更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日本接受美国对汽车、电子计算机工业的直接投资，以实现它多年以来的要求。

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对保护本国企业抱有本能的关心的通产省，在六十年代之初就向欧洲派遣了专家调查团，布置调查美国资本的渗透对各种产业活动的影响。这次调查成果，以《美国资本在欧洲的渗透》为题整理成备忘录，并予以发表，由全体有关人员进行了热心的研究。

这里我们想起了美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它在

1957 年末为 40 亿美元，到 1964 年显著增加到 120 亿美元以上。

当时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战略，是一方面促进所谓“产业改组”(这对于象“八幡”和“富士”组成“新日铁”那样的合并来说，是一种遮掩其最新含意的用语)，另方面提出所谓“五十对五十方式”——即如果外国人出资比率为50%以下的话，可以批准成立新企业。

1967 年 7 月以后，一边再次忠实坚持“不要过早也不要过晚”的原则，另方面分为几个阶段一个一个地扩大了“50%自由化”产业的范围。但是，这种方式仅适用于建立新企业。

外国资本参加现有企业则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企业主的股份在总资本中所占比率低，这种情况使得外国人以其在企业总资本中的极少数量的股份就能够统治现有的大企业。

到了 1973 年 5 月，日本才原则上同意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宪章所主张的“外资流入的完全自由化”，只是在“非自由化货单”里保留了少数几种产业作为例外。但是，在此以前，包括曾经惹人垂涎的汽车、电子计算机在内的大部分产业都依靠日本本身的资本而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完全经得起外国对日直接投资这种形式的任何竞争了。

五　物价上涨和环境问题

垄断与工会

战后日本经济异常高速的增长带来了两个不幸的现象。第一是持续的慢性物价上涨；第二是深刻的环境污染。从原则上说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急剧增长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或者)总劳动时间(或是总的活劳动)的增加。在战后的日本，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但是如在第二章已说明的那样，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更大。

这里又一次回到了原理的问题上来了——在互相竞争的市场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便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降低和伴之而来的市场价格的下跌。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所出现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个理论性的预测是正确的。英国平均每人名义收入从1873年的35.15英镑减少到了1893年的34.71英镑，但是在调整了这一期间物价下跌的因素以后，平均每人实际收入(1913—1914年价格)则从1873年的28.81英镑提高到了1893年的39.00英镑，即提高了35.4%。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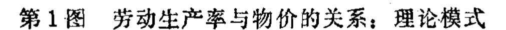
但是，那时恐怕是属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古典的时期了。自那以后，除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几年繁荣时期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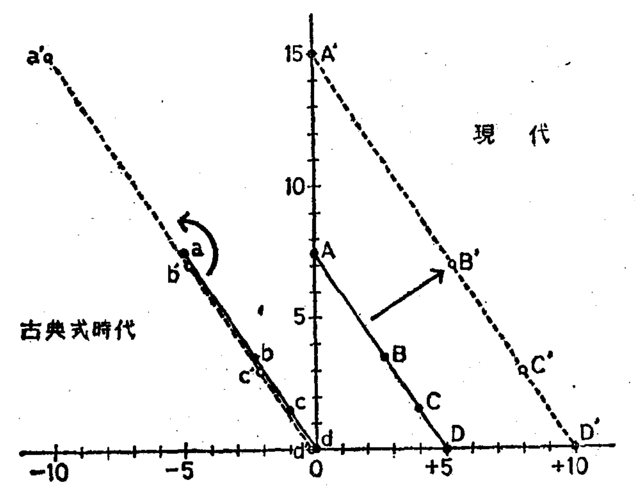
---

① P.迪恩和W.A.柯尔：《英国经济的增长》(1962年版)，第329—330页。

就难以发现互相竞争的各种市场力量有过可与此相比的成果了。

现在，由于垄断企业可以设法依次抬高物价这种市场的不完善性和工会的相当有效的对抗能力相结合，使得日本这样成熟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完全异样的状况。首先让我们通过第1图所示的假设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种截然相反的状况。


第1图　劳动生产率与物价的关系：理论模式



假定在经济中有着下述四种产业部门：(a)汽车制造业；(b)造纸工业；(c)水稻种植业；(d)理发业。再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和现实世界一样，因每个部门的各种技术条件的性质而不同：汽车制造业的年提高率最高，为7.5%；其次造纸业为3.5%；水稻种植业为1.5%；最后理发业为零。假定是在古典式的竞争条件之下，可以设想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价格就定将下降1%的三分之二。如果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

7.5%的话，那么价格将以年率5%的速度下跌。理发业由于假定其生产率是完全不变的，其价格也不变。

这种关系在第1图左侧通过负60度的斜实线表示了出来。这条线联结着a、b、c、d、四个点，d位于原点。接着由于各种技术条件发生变化，假定所有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年提高率都比过去扩大一倍，如汽车制造业由7.5%扩大到15%。这样如果是在古典式的竞争条件下，价格的下降率也将随之比以前扩大一倍，如汽车制造业就将由5%扩大到10%。

这种新的关系，在第1图中通过联结a′、b′、c′、d′、四点的直虚线表示了出来。这条虚线按同一斜度与原来的实线相重合，d′位于原点。如果对这四种产业都按同一加重值计算的话，那么整个经济的平均价格下降率一般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由2.1%扩大到4.2%。

现在再看一看第1图右侧所描绘的与上述情形截然相反的现代的情形吧。在这里，假定和古典式时代一样存在着四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各不相同的产业。但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有一个限制性的假设条件：即无论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提高率最高的产业（在这个例子中是汽车制造业）的价格却不发生变化，表示其价格变化率的点经常处在垂直线上。而且同样还假定，和生产率的提高率最高的产业相比的、其他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率的级差将造成价格的提高，提高的幅度相当于上述劳动生产率提高率级差的三分之二。这时也可以划出一条负60度的斜线来（见第1图右侧联结A、B、C、D、四点的实线）。

这种假定的理论根据有如下三点：(1)在垄断时代，利用

抬高价格这一惯常手段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并不通过商品降价转移给消费者，而相反却由大企业内部的“资”、“劳”双方所分占；(2)工会关心的范围狭窄，主要限于自己在其所属部门及企业内部的相对地位，它的对抗能力有助于上述惯常手段的实现(经营者方面对于工会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在无须提高销售价格就能吸收的情况下一般是倾向于不加特别抵抗的)；(3)由于劳动力市场是涉及整个经济的，因此除了需要训练多年的特殊技能、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能带来固有的危险性和不愉快等因素以外，工资率具有平均化的自然倾向。

如果这些假定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和价格变化率的关系就不仅仅呈现出象第1图中AD直线所表示的那种形式，而且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普遍扩大一倍的情况下，这条直线还将因A点直向上方A′点移动也随之按同一距离向右上方移动，从而呈现出象联结A′、B′、C′、D′、四点的虚线的那种形式。如果对这四种产业按同一加重值计算，那么整个经济的平均价格提高率将由以前的2.9%扩大到5.8%，即扩大一倍。古典式时代与现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即使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是相同的，也是一方面一般出现物价下跌，而另方面一般出现物价上涨。而且劳动生产率提高率越高，前者的价格下跌程度就越大，而后者的价格上涨程度也越大。

第 25 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

		古典式时代			现　代	
		劳动生产率提高率	价格变化率		劳动生产率提高率	价格变化率
汽车制造业	a	7.5	−5.0	A	7.5	0
	a′	15.0	−10.0	A′	15.0	0
造　纸　业	b	3.5	−2.3	B	3.5	+2.7
	b′	7.0	−4.7	B′	7.0	+5.3
水稻种植业	c	1.5	−1.0	C	1.5	+4.0
	c′	3.0	−2.0	C′	3.0	+8.0
理　发　业	d	0	0	D	0	+5.0
	d′	0	0	D′	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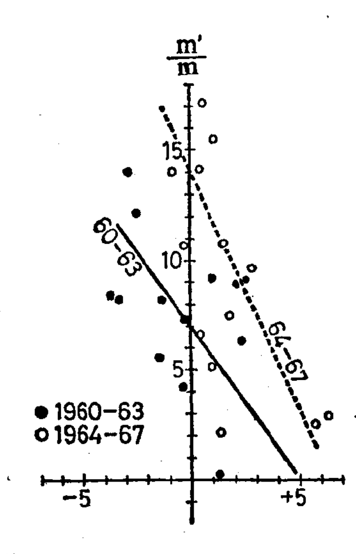
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上边所描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显然是假设的。但是，它却正适用于对日本最近物价上涨的分析，这是难以否认的。例如，政府的“经济审议会”的“计量分析小委员会”为了起草“新长期经济计划期中报告”(1966年发表)，对于1954年到1964年期间日本经济的动向进行了详细的计量分析。当时他们曾得出结论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越高，则消费物价的上涨率也越高。”

从那以来，由于日本过分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因此相应地加剧了物价上涨的发展，这一点已成为常识。这一分析是在原材料及工业燃料供应的伸缩性对日本非常有利的时候作出的，这一点至少表明，这里面所包含的同期性变化的关系不是由于后来冲击世界的、因石油危机而引起的“价格革命”那种类型的原因所造成的。

从对上述假设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理论性估计，现在通

第 2 图　价格变化率(%)



过对几种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率及其产品价格变化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中得到了实际的证明（如第 2 图所示）。在第 2 图里，对 1960 年到 1963 年和 1964 年到 1967年的两个四年的情况作了比较。不论是在哪一个四年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最低的产业一般都是价格上涨率最高的，这就使上述的假设得到了一般的证明。而且由于后一个四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率一般比前一个四年为高，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小自乘回归线明显向右上方移动。

第26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

		$\frac{m'}{m}$	$\frac{p'}{p}$
制造业(平均)	1960—1963	7.4	−0.3
	1964—1967	10.9	+1.6
钢铁	1960—1963	8.3	−3.4
	1964—1967	15.5	+1.1
有色金属	1960—1963	8.4	−3.7
	1964—1967	11.6	+6.2
机械	1960—1963	8.3	−1.4
	1964—1967	14.1	+0.3
化学制品	1960—1963	12.1	−2.6
	1964—1967	14.0	−0.9

石油煤炭产品	1960—1963	14.0	−2.9
	1964—1967	17.2	+0.4
纸浆	1960—1963	9.4	+1.0
	1964—1967	6.7	+0.4
纺织	1960—1963	6.3	+2.2
	1964—1967	9.4	+2.9
食品	1960—1963	0.3	+1.2
	1964—1967	2.1	+1.3
橡胶制品	1960—1963	5.4	−1.5
	1964—1967	5.1	+1.0
皮革制品	1960—1963	9.0	+2.2
	1964—1967	2.9	+6.2
制材・木制品	1960—1963	−2.2	+7.3
	1964—1967	2.4	+5.6
陶器	1960—1963	9.1	+2.3
	1964—1967	7.5	+1.9
卷烟制造业	1960—1963	4.1	−0.2
	1964—1967	10.8	−0.1

注：表中的$\frac{m'}{m}$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提高率，$\frac{p'}{p}$表示批发价格的年平均变化率。前者引自对“日本生产率本部”调查的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后者是根据日本银行编的批发物价指数（类别）计算的。

如果我们扩大一下分析的范围，再把农业及服务行业等制造业以外的产业部门包括进去，那么上述用来说明慢性物价上涨与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并存这一事实的命题将能得到更有力的证明。

而且，通过对几种产业的垄断价格政策及工会在每年的集体谈判中的行动方式的详细调查，上述假设命题也能得到更有力的证明。值得指出的一种情况是，生产率提高率最高的产业正是工会的对抗能力最强的产业。

只要上述这些条件与其他各种市场的不完善性一起继续

存在下去，对于今后的日本经济来说，除非在政治上能够采取有效的所得政策手段，否则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就难以避免地要带来与此成比例的慢性物价上涨。

为在估计今后物价动向时作参考，这里按年度把过去二十年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并列在下表里(参照第 27 表)。要稍加说明的是：(1)批发物价指数从1952

第27表　年度别物价变动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1955—1975)

	批发物价指数(%)	消费物价指数(%)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1955	−1.8	−1.5	8.8
1956	4.4	0.9	7.3
1957	3.0	2.8	7.4
1958	−6.5	1.0	5.6
1959	1.0	1.3	8.9
1960	1.1	3.7	13.4
1961	1.0	5.2	14.4
1962	−1.7	6.7	7.0
1963	1.8	7.9	10.4
1964	0.2	4.0	13.2
1965	0.8	7.2	5.1
1966	2.4	4.8	9.8
1967	1.8	4.1	12.9
1968	0.9	5.6	13.4
1969	2.1	4.6	10.8
1970	3.6	7.2	10.9
1971	−0.8	6.3	7.3
1972	0.8	4.8	9.1
1973	15.9	11.8	9.9
1974	31.4	22.6	−1.2
1975	3.0	15.8	2.1

资料：根据日本银行编制的物价指数和经济企划厅推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计算。

年到1962年的十年里实际上是稳定的，其后在1973年由于“石油冲击”出现爆发式的上涨之前的十年里，也只提高了14.4%；(2)另方面，消费物价从日本进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两位数时代的1960年起便开始持续上升，在1952年到1962年的十年里上升了38.4%，在1962年到1972年的十年里上升了74.8%。

惊人的密度

“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听惯了的略语，对日本来说，恐怕比其他国家更可以说是“国民总污染”的略语了。在过去二十年里日本的极其高速的增长是在牺牲各种不能买卖的舒适环境的基础上获得的，同时它也使一般群众蒙受了花钱也不能解脱的牺牲。

事实上，在以出售商品为目的的经济环境之中所采取的污染对策本身，就有助于创造有效需求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这和那个几乎成为谚语了的欧洲共同体的笑话一样——为了创造杀虫剂和蚊帐的销路，特意通过“进口”蚊子而解决了失业问题。

而且，别的国家常常指出，环境问题“乃是收入达到相当高水平之后才必须出来干预的一种浪费”。① 但是，日本的一般特点却是：在环境遭受破坏的地区里，越是属于该地区中的贫困居民，就越受到破坏性的影响。

对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到下述情况就决不会感到惊奇

---

① 见上述H.帕特立克和H.罗索斯基合编书，第906页。

了——日本是个在单位可居住面积里工业密度最高的国家，它在这种意义上比它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更为独特。例如，在七十年代初期，每一千平方公里可居住面积的石油消费量西德为4,990万桶，英国为3,150万桶，而日本却为8,770万桶。

同样，每一千平方公里可居住面积的电力消费量，西德为1,330亿千瓦，英国为1,090亿千瓦，而日本却为2,680亿千瓦。以上事实就是“日本股份公司”之所以象上述那样拚命努力去填海造地的背景。

但是，这种努力明显地破坏了环境，濑户内海的现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濑户内海是被指定为国立公园之一的，“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法”（1973年）曾经称它“不仅是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秀丽无比的风景胜地，同时也是国民的重要渔业资源宝库”。

但是，在那里为了发展工业，填海造地持续了十年甚至十年以上。而且，在这个内海的沿岸还有被日本的三个主要岛屿所包围、通过三个海峡与太平洋及东海相联结的2万2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那里集中了日本炼钢能力的53%、炼油能力的40%、石油化学生产能力的35%、炼铜能力的63%以及炼铝能力的76%。

总而言之，这个地区的工业能力比英国同类工业能力的总和还要大，其五百公里以上的海岸线现在都变成了混凝土的人工墙壁。过去它曾是日本自然美的展览地，但是现在从环境保护的观点看来已成为问题最大的地区，尽管在大力采取对策，但是情况却继续恶化。这种情况也是完全自然的。

例如，在这个海域有代表性的观测点上观测到的平均透

明度，从1953年的9.3米降至1972年的6.3米，在同一时期里，含氮浓度由100万分之1.5提高到了100万分之3.6，含磷酸浓度由100万分之0.33提高到了100万分之0.54。

据报道，“赤潮”及海草的异常繁殖现象①，在1950年仅出现了4次，1970年出现了79次，而1974年竟出现了298次。

濑户内海所发生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几乎不顾保护环境的舒适而盲目追求高速增长的一种动物性精神的典型作法。

在高速增长时期环境污染的过程中，下述情况是其特别明显的方面：（1）一般要比其他产业造成更多污染的重工业及化学工业极其迅速地相对扩大（参见上述第二章）；（2）向城市集中的程度比人口的变化进展得远为迅速②；（3）特别是私人汽车在大量的消费需求中出现的景气具有爆发性的特点（它使具有补充性质的社会间接投资出现了可怕的落后局面）③。

增长主义的挫折

那么，可以和高速增长过程相提并论的日本的环境问题

---

① “赤潮”，是因某些浮游生物异常急剧地繁殖而引起海水改变颜色的现象。在发生“赤潮”的海域里，氧气大量被消耗，同时浮游生物还分泌出强毒素，造成鱼类大量死亡，严重影响渔业生产。——译者

② 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的人口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期间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即从3,738万人增至4,826万人。

③ 日本平均每一千人所有的汽车辆数从1959年的3.4辆增至1975年的15.0辆。1969年平均每100公顷平地面积有各种汽车达1,300辆以上，次于日本居第二位的西德为750辆。

恶化的具体程度究竟如何呢？一般来说，这种恶化在量上的尺度是由以下三个方面来表现的：（1）在发生地出现的污染物质；（2）可以客观地进行测量的污染现象；（3）人及其他有价值的对象蒙受的损害。

如果从这一方面过渡到另一方面，仅仅通过“污染”这个单一的尺度去进行国际比较，即使是对同一地区的各个时期进行比较也是非常容易招致误解的，因为当地还存在着各种固有的特点。而且还有一点是极其重要而不可忘记的，即是在发生环境污染的地区里，特别是随着从上述第二个方面向第三个方面的过渡，还常常出现由量向质的转化。

换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际比较，在衡量污染的绝对物质数值的时候，重要的一点是经常从它同其环境所具有的吸收能力、地理位置、人口密度等情况的联系上加以衡量。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引用一下已经测出来的污染物质氧化硫和氧化氮的一组典型数字，上述两种物质在1951年到1971年期间增加了12倍。情况如第28表所示。

第28表　污染物质

（单位：每平方公里、吨）

	氧化硫		氧化氮	
	1955	1971	1955	1971
东京沿海	18.3	165.2	2.3	68.3
名古屋沿海	8.4	71.7	1.0	27.4
大阪·神户沿海	27.8	188.2	3.0	61.1
上述三地区计	16.2	131.3	1.9	49.8
全国	6.6	45.6	0.6	17.0

资料：庄司光和宫本宪一：《日本的公害》（日本的环境破坏），岩波新书，1975年版，第50页。

类似这样的统计可以举不胜举。但是，在日本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情况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最初时期就发生了，而且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对此类情况最早的报告是关于1953年在水俣地方发生的猫和乌鸦痉挛性死亡的报告，接着又在水俣地区的居民中间发生了“怪病事件”，1956年5月最早向保健所呈报说这种病是由氮中毒引起的。

其结果，这个事件便成为有名的“甲基汞祸”事件，包括死掉的50余人和现在被正式认定的“水俣病患者”，它至少使684人蒙害致病。象这类影响人类健康的第二起事件是1955年报告的、发生在神通河沿岸某地区的叫作“疼痛病”的一种痛苦很大的病②，这种病与工业废水中含镉有关。

第三起是四日市居民因气管炎突然增加而到市政府告状事件③，此事发生在1959年。

这些事件后来都被提交到了法庭，在大部分国民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议论。但是，六十年代仍然是“单纯增长主义”的十年，环境问题的这种重要性还只为少数有关的科学家和直接受到影响的居民所认识。

但是，由于日本继续推行增长主义，技术这个经济的加厄

---

① “水俣病”，是1953年到1960年期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周围发现的一种“公害病”。患此病者手足麻木、眼睛失明，以至于发疯而死亡。经调查，此病是由工业废水中所含甲基汞化合物引起的。——译者

② “疼痛病”，是在日本富山县神通河下游地区发现的一种“公害病”。因患此病者肾损骨痛，发出“疼呀疼呀”的惨叫声，故名为“疼痛病”（国内亦有译为“骨痛病”的）。据调查，此病主要是由工业废水中所含镉引起的。——译者

③ 四日市，是日本三重县内的一个市，在该市的石油联合企业周围发现的一种呼吸器官方面的“公害病”被称为“四日市哮喘病”。——译者

诺特神（如果被此神乘坐的车子辗死，便可以走向极乐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能驾驭了，它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起来反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工业污染的居民运动也越来越频繁发生，同时也越来越有效果。例如在1964年的三岛—沼津事件中，居民为了反对在当地建立联合企业的计划而发起的运动就取得了成功。这样，终于使政府不得不全面地认真处理环境问题了，于是起草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在1967年7月通过。

从196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呼吁召开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到日本不久在1970年春天主办讨论环境破坏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国际讨论会，其动向进一步强烈起来。

这次国际讨论会在多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特别是闭幕时所通过的“东京决议”，其中有下边一段话：

“我们强烈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把下述原则确立到法律体系当中去——即作为一种基本人权，人人皆有权享受不被有损健康和福利的因素所破坏的环境，皆有权分沾包括自然美在内的、现代人应该留给后代人的遗产——自然资源。”

而且，这个宣言还起了一种跳板的作用，它促使对市民在环境方面的权利从基本上重新加以考虑。其显著效果之一就是对“公害对策基本法”中的提法进行了修改。1967年制定的这个法律是包含着对私人企业利益的妥协的。这种妥协的表现就是在表明该法律的目的的第一条里增加了下面的一节内容：“在按上节的规定保护生活环境的同时，必须照顾到它与健全发展经济的谐调”。

这个所谓"谐调条款"的意思就是说，防止环境污染的必要性不是绝对的，有时还要为振兴经济活动而作出让步。这种提法在制定"基本法"的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批评，其后几年之中都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

因此，政府当局最后提出了"基本法"的修正案，决定把有争议的这一节删掉。1970 年，国会通过了这个修正案。

这样，在第一条第一节中所阐述的目的就变成了："在保护国民健康的同时，要保护其生活环境"。和以前相比，就不是相对的了。

关于环境问题的诉讼事件，在过去五年中间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发展。从 1971 年 6 月到 1973 年 3 月，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四起主要的诉讼事件都是以代表环境污染的牺牲者——原告方面的胜利而告终的。这些事件就是：（1）镉中毒引起的"疼痛病"事件；（2）由汞中毒引起的"新泻水俣病"事件；（3）有关呼吸器官病症的"四日市公害"事件；（4）由汞中毒引起的"熊本水俣病"事件。

现在，社会对整个环境问题的看法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情况相比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一点，从日本制定的空气清洁度及汽车废气的标准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远为严格这种情况中也反映出来了。最近的调查结果如第 29 表所示①。

从表 29 可以看出，日本对空气清洁度中的二氧化氮规定

① 此表是作者根据各国政府资料编制的。

第29表 环境标准

	空气清洁度目标(1975) *a*			汽车废气标准			
	二氧化硫 (百万分比)	灰 尘 (毫克/米^3)	二氧化氮 (百万分比)	年次	一氧化碳 (克/公里)	碳化氢 (克/公里)	氧化氮 (克/公里)
日 本	0.04	0.10	0.02	1976	2.10	0.25	0.60
日 本				1978	2.10	0.25	0.25
美 国	0.14	0.26	0.13	1975 *b*	9.30	0.93	1.93
加拿大 *c*	0.06	0.12	0.10	将来	2.13	0.25	1.94
法 国	0.38	0.35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瑞 典	0.25	不详	不详	1975	24.20	2.10	1.90
意大利	0.15	0.30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a 所有数值都是平均每天的数值或与此相当者；*b* 为英国政府的标准；*c* 为蒙特利尔州的标准。

的标准和对汽车废气中的氧化氮的限制是特别严格的。而且，事实上这些在日本国内正成为汽车厂家和关心此事的群众所热烈议论的对象。

表明日本在防止污染对策方面作出突出努力的另一个指标是防止公害的投资在日本企业设备投资总额中所占的相对比重。日本的这一比重在1965年为3.0%，现在这还是其他许多国家的一般水平。但是，后来这一比重在日本逐年提高，1969年为5.0%，1972年为8.6%，而到1975年则终于达18.6%了①。

私人企业防止公害投资的绝对额在十年中间增加了39倍，从1965年的297亿日元增至1975年的1兆1,783亿日元。

尽管作了这一切努力，但是就一般群众的心理来说，对于

① 环境厅:《环境白皮书》(1976年版)，第513页。

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私人企业和政府机关的所有活动，依然持批判的态度。

而且，现在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计算费用和利益的问题了，而正在成为以“环境权”、“身体保护权”、“游览海滨权”、“光照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权问题。

六 展望

增长基础的消失

上述调查试图说明大约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本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所走过的高速增长的路程。它同时也有助于说明增长率最终将要放慢的问题。

第一，战后一时出现的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下述刺激效果，到六十年代末期在不同程度上已被利用完毕了。

这些效果有：犹如那个久病初愈的打高尔夫球者受到的照顾一样，原来为日本制定的有余地的汇率所带来的有利效果；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赶”的过程；在推迟实行自由化政策时期出现的温室保护效果；通过在沿海填海造地向企业提供方便的、包含有补助金在内的工厂用地，这种办法所带来的仅可利用一次的效果。

另外产业结构向附加价值高的部门转化，也曾对高速增长起了作用，但是到七十年代上半期这也达到了顶点。对于产业的特别减税免税措施和所谓“低利率政策”由于受到一般群众的反对，今后是否还能象过去那样稳固地加以依靠也是个疑问。

广泛采取的“行政指导”及家庭的强烈贮蓄倾向这类日本独有的特点今后可能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因素来支撑象过去那样异常高比率的私人投资几乎是不可能

的。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只能用绳子去拉，而不能用绳子去推”。

除了上述各种问题以外，还出现了保护环境这个新问题，这对追求商品销售市场的经济活动来说，最终只能起到使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

因此，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对于日本经济将来的预测渐渐地减少气魄了。而且政治家们作为政策问题也开始谈论什么“稳定增长”或者“能够稳定维持的增长”了。

就在到了这种转折点的1973年秋季，“石油冲击”袭击了日本。日本对于国际市场原料及燃料价格的上涨特别缺乏抵抗力，在1973年10月到1974年1月期间原油涨价四倍，这马上影响到了日本经济。从第30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上半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有效需求的各种构成因素出现了急剧的减少。

第30表　实际需求的减少（1973—1974年）

	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上半年的变化率（%）	各种构成因素占减少总额中的比重（%）
私人消费支出	−8.5	40.5
政府经常支出	3.7	−2.3
政府资本形成	−6.6	5.4
私人设备投资	−19.8	58.3
库存投资	−0.6	0.2
出口及海外收入	1.6	−2.2
国民总需求	−9.2	100.0

资料：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根据1956年价格的实际数值计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效需求中各项目出现的减少额合计起来，事实上全部可以由“个人消费支出”和“私人设备投

资”这两项出现减少来加以说明。日本也就这样进入了经济衰退倾向和物价上涨同时并存的“停滞膨胀”时代。但是，日本的这一新的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明显地是基本上在下述条件下产生的——即这次随着原料及工业燃料成本的不可扭转的上涨而出现了新的“价格革命”，这一特点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很快就被人们认识到了。

日本的企业目前对付这个“价格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暂时把过去获得的大量利润作为“缓冲器”以调节成本的提高，然后再争取时间努力寻求新的出路。

我们采用从帐面利润减去折旧部分和库存价格变动差额的办法来计算一下大企业的“实际利润”，如第 31 表所示，它在从 1973 年 10 月到 1974 年 3 月这一会计时期突然转为亏损了。

第 31 表　主要企业的“实际利润”

（单位：10亿日元）

会计年度		
1965年度—1970年度(平均每半年)		530
1971年度：	上半期	570
	下半期	570
1972年度：	上半期	490
	下半期	400
1973年度：	上半期	580
	下半期	−410
1974年度：	上半期	260
	下半期	290
1975年度：	上半期	−80
	下半期	130

资料：根据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76年版第278页)和日本银行《主要企业经营分析》中的统计作出。

一直持续到 1973 年会计年度上半期的“美好的往昔”以石油危机为分界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75 年会计年度上半期(1975年 4 月到1975年 9 月)整个大企业平均又一次出现了亏损。失业人员也从 1972 年的平均 73 万 5 千人增至 1974 年第四季度的 85 万人，1975 年第四季度则达到了 113 万人的高峰，而在这一过程中就业人数相对减少得最厉害的便是妇女和老年人。

但是，在这一期间里美国却首先进入了景气恢复阶段，其国民生产总值经过 15 个月的连续下降之后，到 1975 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比上季度增加 0.8%的记录。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计算①，如果美国增加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1 %的自发性投资，那么就会给其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带来好的影响，它可使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0.5%，使日本和其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0.35%。另方面，这又将反过来影响美国，使美国获得加倍的效果。

结构调整的时代

假如西德这样的国家增加同样的投资，它所产生的推动效果和上述美国的情况大不一样，西德增加同样的投资恐怕只能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0.1%。但是无论如何，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活动同时出现景气或不景气的时代里，我们也是明显地被卷入进去的。

---

①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8》(1975 年 12 月出版)。

而日本经济便以下述形式对此作出了反应：即在美国景气恢复的带动下立即增加了对美国的出口，其后不久又增加了对西欧各国的出口。

1975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刚开始转入恢复，便出现了进口的增加，但是主要增加的是石油进口和从发展中国家的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

但是由于在那个季度里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汽车进口大幅度减少，上述增加部分便被抵消了。但是，它从日本的汽车进口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恢复。

而且美国的进口商品构成在1975年第四季度出现了向耐久消费品和机械类的转变，这就意味着将给日本的出口产业带来景气。由于日本有关出口的产业当时在成本到价格方面享有有利的条件，所以尽管"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同时出现的经济恢复还很微弱，但是日本却通过上述条件利用上了。

日本的出口价格指数对世界出口市场的价格指数的相对比率(两者皆以1970年平均水平为100)，从1974年第三季度以来一直下降。同时按美元计算的日本出口价格指数与同样按美元计算的世界市场工业品价格指数的相对比率，在从1975年第一季度到1976年第一季度的一年期间里下降了4.3%。

此外，在同一时期里，日元对美元的汇价相当于贬值2.3%，它给日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带来的相对有利影响是决不可忽视的，这一点对于钢铁制品来说特别明显。

以上就是日本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出口在

1976 年上半年获得显著增加的背景，这在欧洲各国的首都都曾经大受责难①。

日本在景气恢复过程中出现的贸易不平衡，明显地触怒了其他国家。日本的出口从 1975 年年中开始持续增加，但是日本的进口却与出口很不协调，其结果日本的贸易收支急剧地转为顺差。

1974 年第一季度，日本的贸易收支逆差曾为 184,900 万美元；但是在一年之后便一变而为 69,300万美元的顺差了，这主要是由于大幅度减少进口造成的。而且，当时虽然曾预计工业生产长时间的持续恢复将会引起对原料燃料的新需求，但是到 1976 年第一季度，上述盈余却进一步增加到了 271,500 万美元。

日本经常收支中的贸易以外的项目通常都是赤字的，因此如果欧洲各国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来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限制出口、增加进口的话，那么日本 1976 年的经常收支尾数也可能仅出现少许顺差。

假如日本经济能够成功地恢复高速增长时期那样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也完全可以预言，日本的进口倾向将如六十年代那十年同样强烈。

但是，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却是：现在对日本来说，其经济的高涨期正在过去，从几个方面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课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不可否认的。

日本是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且尽管有一些重要的经济

---

① 例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1976 年 8 月 7 日号（第 55—56 页）和 1976 年 10 月 23 日号（第 91—92 页）。

活动实行了国有化，或者处于国家的垄断之下，国民贮蓄的相当大部分也通过政府机关而转变为企业资金，但是从制度上来说，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却还是私人利润，经济的主导权还是依靠企业家的主动精神的。

但是，就在这个广阔的组织机构之中，日本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且其影响深深波及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生产力的显著发展，证明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是成功的。

增长率必然下降

但是，正如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成功的本身就常常削弱那曾经使它强大起来的结构。而且我们还能从比熊彼特早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发现同样的洞察力。

马克思这样写道：

“但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财富的力量已经不复是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在劳动时间以内所运用的动原（Agentien）的力量，而这种动原自身及其动力效果又跟它在自身的生产上所消耗的直接劳动时间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间，作为生产和财富的主要台柱而出现的，既不是人类自身所做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他们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被人占有的人类所有的一般生产力，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人类通过他们作为社会机体的客观存在形态而征

服的自然——一言以蔽之，发展起来的群居的个人。……

"一旦在直接形态之下的劳动不复是主要的财富源泉，劳动时间也就不能而且一定不能再作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同样不能再作使用价值的尺度。……这样一来，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垮台了，……"①

对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进行详细的讨论，是本文研究范围以外的事情；但是马克思所说的"交换价值必然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句话却与现代的下述争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即在社会生产之中，其材料方面和价值方面之间是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这种对应的关系？

如果可以假定这种对应的关系是以或多或少值得满意的形式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几分把握地说，国民生产总值这种量的尺度是反映全体国民经济福利的相对大小程度的。

但是，日本在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表明，即使对国民生产总值按固定价格进行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难以期望国民生产总值这种量的尺度能自动地反映经济福利的大小程度及广度了②。

而且，人们逐渐抛弃了"增长主义"的心理，而越来越关心提高生活的质的方面了。这一潮流恐怕是难以改变的。在这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柏林荻茨出版社，1953 年版），第 592 页。

② 都留重人：《代替国民生产总值》（最初发表于 1971 年巴黎"人类科学协会"主办的"关于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会"，1972 年由穆顿出版社出版）。

里，象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当然如此的——由于日本高水平的经济活动过度集中，从而出现了种种损害整个社会利益的现象，这些现象直接地影响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们，而且也破坏了日本列岛的美好环境。不管愿意与否，人们都会想起凯恩斯在关于“我们孙辈可能有的经济”的论文中的一节①。

他这样写道：

“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能发生迄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在经济需要方面事实上获得解放的各阶级和集团的人们将越来越多，这恐怕就是上述事态的进程。这种事态普遍出现以后，其结果将使对周围人们的义务发生变化，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经济方面抱有目的意识即使对自己本身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以后，它对于别人可能仍将是有意义的”。

凯恩斯还写道：一旦进入了那样的阶段，“我们将重新变得尊重目的超过尊重手段、选择好的超过选择有用的”。

当然，日本还没有达到这种经济上的最幸福的阶段。但是，一般群众对社会公平的不懈要求和重视生活中的质的方面的态度（即比起手段来更尊重目的），在增长主义时期以后已有了坚固的基础。

日本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之所以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无论如何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必将下降。还没有成熟的日本经济恐怕就这样已经走向了成熟。

---

① 凯恩斯：《劝说集》（1931年），第372页。